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龙文化

回顾与展望 1



龙文化—回顾与展望

第一章 绪论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屈原《天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易·象传》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当欧洲大陆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用他们灵巧的双手，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就已经对身棲目染的客观世界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人们的认识不能不受到各种限制，然而，他们毕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一脉相承、从未间断的修养生息中，形成极具特色的习尚礼仪、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表现出极强的向心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当我们以人类文明为背景、中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成熟文化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堪与西方文化相媲美的文化系统，它能够而且必须在人类生活中不断发挥其作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意义和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它已经与现代文明同化为一体。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迄今为止，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是很不够的，甚至不乏苛求、偏见和贬斥。这一宝库有待于人们来共同发掘。

第一节 曰文曰化

“文化”一词，在中华民族语言中古已有之。最初，文和化两个字是分别使用的，有丰富的含义。

文，一谓色彩交错、纹理（《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乐记》：“五色成文不乱”；《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汉书·食货志》：“其文龙”；《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二谓刺画花纹、修饰，这是由上一种用法引申而来的，用作动词的重要用法，不可忽视《礼·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礼·玉藻》：“不文饰也不裼”；《南史·孔范传》：“曲为文饰，称扬赞美”¹。三谓文字《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四谓文章典籍（《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唐孟郊《孟东野诗

¹ 作动词也谓撰：宋陈抟《太一宫记》：“帝亲文其碑”。

集》：“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五谓礼乐制度（《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在上两种意义上使用的。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六谓文华、辞采，与质相对（《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心雕龙·原道》：“逮及商周，文胜其质”）。七谓文德教化《尚书·大禹谟》：“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礼·祭法》：“文王以文治”。八谓美、善《礼·乐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注：“文犹美也，善也”。九谓法令条文《史记·张汤传》：“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十谓非军事的，与武相对。如文人、文官、文武全才《礼·祭法》：“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化，一谓变化（《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化而为鸟”）。二谓造化。自然的功能（《素问·五常政大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三谓生（《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郑玄注：“化犹生也”）。四谓化生之物（《礼·乐记》：“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五谓习俗风气（《汉书·叙传下》：“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六谓教行、易俗《说文解字》：“化，教行也”；《书·大诰》：“肆于大化，诱我友邦君”；《礼记·学记》：“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管子·七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七谓焚烧（《礼·礼运》：“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八谓融解、消化。如食古不化，化痰止咳（苏拭《物类相感志杂著》：“银铜相杂，亦易熔化”）。九谓迁善（《荀子·不苟》：“神则能化矣。”注：“化，谓之善也”）。十谓泯除差别、趋同（《庄子·齐物论》：“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今之“化”亦用指转变、趋向于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知识化，现代化。

“文”与“化”联用，亦较早见之于典籍。《易·贲·象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与“化”合而为一具有特定意义的范畴，指封建王朝所施“文治”和“教化”。西汉刘向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广微《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从中国古代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而论，其含义与西方及现代

的理解差别较大，基本上是从狭义上来使用的。但是如“文”、“化”分言，综合古代对“文”、“化”、“文化”的理解，则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广义文化所涉及的内容。虽然，从古人对“文明”的理解而论（《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永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如某些论者所说似乎更为切合 culture（文化）。但如从“明”和“化”二字而言，“化”字在汉语言文字、传统思想理论中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其指称的事物与西方及现代对文化的理解而言，“明”字对于“化”字差之甚远。尤其是“化”字的动态意义（作为，变化，生化），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显然，中国近代学人在译介 culture 及相关词汇时，采用“文化”而不采用“文明”是非常正确的，值得赞誉的。

在西方，文化是拉丁语动词 colere 的派生词，原意谓人为生存需要而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在古希腊罗马时发生转义，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培育公民具有参加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被逐渐列入文化范畴。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禁锢以后的 17 世纪，文化作为独立的概念提出并使用。S·普芬多夫、伏尔泰、康德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定义。19 世纪中叶以后，“文化”概念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热心讨论的题目。泰勒（英）认为：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的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此后出现了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等对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界定。美国文化学家 A·克罗伯等分析了 160 多个文化定义，把它们归纳为列举描述性、历史性、规范性、心理性、结构性、遗传性定义 6 类。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指出：（1）文化包括行为的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2）模式不论外现或内含，皆由后天学习而得，学习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构造的“符号”系统；（3）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物化体现于人工制品中，这些制品也属于文化；（4）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据此以区别；（5）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的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苏联学者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广泛讨论了“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不仅是业已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是创造、分配和消费这些财富的过程本身；文化是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并在这种活动的一定结果中被对象化了；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特殊方式，是手段和机制的特殊体系，由于这种方式和体系，个人可以对周围世界采取积极的态度。苏联学者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中国近代以来，学者们借鉴西方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文化定义。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是包含人类

泰勒《原始文化》，1871 年。

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他没有完成的《中国文化史目录》，计划包括朝代篇、种族篇、政制篇、法津篇、军政篇及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学术思想等共 28 篇。蔡元培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无所不包。”陈独秀不同意把文化定义得过于宽泛，认为“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种”。胡适认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贺麟认为“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过的自然”。冯友兰认为文化是一种“总合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

文化问题研究在中国，50 至 70 年代，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沿用《辞海》的广狭二义说：“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除辞海外，时下较有影响的辞书，对文化的定义还有如下几种：（1）《辞源》：文化“今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2）《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的能力和 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这一定义较之前两种，显然是更为全面些。

80 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对文化问题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在 1986 年前后达到高潮。不仅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而且也进行有关的文化学理论研究，对“文化”概念本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定义。这一研究方兴未艾。

文化问题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与人的意志行为密切联系，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对象性活动确立了与外部世界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人使自己的意志、

《什么是文化》，载《学灯》1922 年 12 月 7 日。

《蔡元培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第 113 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

《胡适文存》，3 集 1 卷。

《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32 页。

《三松堂学术文集》，第 43 页。

目的外化、客观化，使对象世界人化，给自然界打上意识的印记，赋予对象以合目的的形式，使之具有属人的意义。同时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自身，表现和确证人是能动的有意识有目的类存在物，从而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与天然的、本然的事物和现象相区别的，人类意志行为及其结果就是文化。具体表现为三个环节和诸多方面：（1）意志行为主体：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能力；（2）行为方式和手段：物质技术（工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科学理论系统、社会结合方式；（3）意志行为结果：物质产品、精神产品、还有作为思想创物质附属物的“制度”，它既是意志行为者的社会结合方式又是意志行为的产物，而且人本身也是主体与客体、创造者和被创造的统一。我们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从这种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和使用“文化”范畴。

第二节 龙文化

中华民族又称为华夏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华先民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氏族公社时期，黄帝和炎帝是最著名的两个部落首领，属华夏集团。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东夷族、苗蛮等。黄帝战炎帝、杀蚩龙，形成中原地带最为强大的部落。在氏族部落冲突中吸收了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之一部分，形成了春秋时代称为华族，汉朝以后称为汉族的强大民族。由于中华先民早以“诸夏”、“华夏”、“华”、“夏”自称。延至今日，就有了华夏族、华夏儿女的称呼。由于黄帝、炎帝在部落联盟时期的重要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又称为炎黄子孙，或称为黄帝子孙。

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系与神秘的龙崇拜有关。对龙的崇拜则应追溯到原始氏族公社的图腾崇拜。尤其是与对蛇的崇拜有关。《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对蛇的畏惧和崇拜使某些氏族以蛇为图腾。《列子》记载：“女蜗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骨虎鼻。”《山海经》说：“共工氏蛇身朱发。”《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列子·黄帝篇》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师熊、罴、狼、豹、貔、虎为前驱，雕、鸇、鹰、鸢为旗帜”，当与图腾崇拜有关。《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娇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在山东嘉祥的汉石刻中，甚至有“龙身人首”的伏羲与蛇身人面的女娲的交尾图。《竹书纪年》说伏羲氏各氏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春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人们认为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在与以马、鱼、鹿、驼、龟、鹰、牛、虎为图腾的部落融合后，形成新的崇拜对象——龙。其“角似鹿、头似蛇、眼

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它善变化、兴云雨、利万物，“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充满神秘感。夏代以龙为图腾。成汤灭夏后，夏族大部分迁居北方，小部分迁往吴越，多以龙为崇拜对象。《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每年祭龙三次，名曰龙祠。”

中国自夏代开始，对龙的崇拜历久不衰，龙的观念，龙的形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1）帝王与龙两位一体，使帝王神化，更具威严。《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帝王被称为“真龙天子”；帝王有病，就说：“龙体欠安”；皇帝有恩赐，大臣口称：“谢龙恩”；皇帝所乘之车驾称之为“龙舆”，其衣为龙袍。（2）器物上饰以龙纹以示威仪。《礼·明堂位》说：“夏后氏以龙勺”，“有虞氏服黼……周龙章”。《诗·商颂·玄鸟》说：龙旗十乘，大辂是承。商周青铜器上多见有龙纹。封建帝王的宫殿、器物随处可见龙纹。（3）民间工艺品、器具上常饰有龙纹。（4）文学艺术作品中常有关于龙的神话。如小说《柳毅》、《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异录记》、《太平广记》等。（5）以龙为主题的民间风俗。如舞龙，划龙舟等。（6）以龙命名山川城池，楼台殿阁。称隐士为“卧龙”，人才辈出之地称为“藏龙卧虎之地”，封建时代的状元称为龙头，并时常作为人名用字，反映出龙在我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龙的传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世代更替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龙文化”，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龙文化的创造主体是智慧、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华民族。我们注意到，中国是重要的人类发祥地。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由古猿的一支进化来的。在我国云南开远地区，曾发现森林古猿牙齿化石。在云南禄丰，曾发现两个西瓦古猿头骨和三个腊玛古猿头骨。在我国鄂西，曾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直立的南方古猿的一支进化为早期猿人（猿人亦称直立人），我国的元谋猿人生活于距今170万年左右，为早期猿人。著名的北京猿人是晚期猿人的代表。广东马坝人属早期智人（古人，“尼人”），山顶洞人属晚期智人（新人、真人）。国内发现的其他猿人和智人化石还有蓝田人、郧县人、营口人、南召人、合县人、大荔人、许家窑人、长阳人、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等。这些遍布于中国版图上的重要发现，说明该地区是重要的古人类发祥地，是地球上最早被“人化”的地区之一。在他们的生息和劳作中，一种重要的文化在孕育。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和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勇敢、善良的品格，由他们的双手，创造了灿烂文化。

龙文化的自然载体是地理景观复杂多样的东亚大陆。这里负陆面海，跨

罗愿《尔雅翼·释龙》。

《说文解字》。

热、温、寒三带。但我国东部陆海景观的特点是太平洋广阔浩远，造成中国大陆与彼岸板块相距遥远，沿海又无陆海交错、港湾纵横、岛屿呼应的条件，致使太平洋一度成为中华先民对外联系的屏障。加之西、北部高山大漠的阻隔，造成龙文化的半封闭型大陆文化特征。在中华大地上有高山大漠、林海雪原、大江大河、一望无际的内陆草原和沿海平原，为中华先民提供了壮阔的舞台，复杂的环境锻造着他们的性格，丰富的资源为龙文化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

龙文化的经济类型——农业文化。继渔、猎、采集经济之后，中华民族过渡到农耕时代。虽然在西北部地区生活着游牧部落，但华夏族的主体是从事农耕。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殷商时期的井田作业，到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经济和个体小私有制经济地位。加之对体力劳动和技艺的轻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等等，限制了耕作技术的改进、手工业的发展，致使中国在近代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以手工劳动、畜力耕作为特征的落后农业国，终于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经济面貌制约着整个文化景观，形成落后的农业文化。

龙文化的政治特征——“宗法—专制”型文化。中国是在原始氏族制没有彻底解体，从而带着浓厚的血缘色彩进入奴隶社会的。并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体系。并在奴隶制世袭制、分封制之后形成了建立在纲常伦理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制度的基层仍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家族社会，致使龙文化带有鲜明的宗法色彩、伦理色彩，重整体、统一，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

龙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特征——土生土长的单一型文化。龙文化自曙光初照至今，一脉相承，从未因异族入侵、异质性文化的冲击而中断、转换，也没有与并驾齐驱的异质文化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在 5000 年的文明史上，虽曾有过魏晋隋唐时佛教的兴盛，近代以来西学的传入。但这些异质文化除了部分地被借鉴、吸收到龙文化体系之中外，并未对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古老的龙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色绵延至今，以其固有的特色和顽强的生命力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第三节 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不能不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更不能不正确地对待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民族，当其在以世界文化总体为背景，中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而痛感自己已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时候，更应对传统文比抱有正确的态度。

一、认识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任何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提高向心力、凝聚力；调动民族振兴、自强不息的热情；焕发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等等。凡此种种，说明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必要。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美籍华人成中英认为，研究中国文化独特之价值，有下列几种意义：（一）生为中国人，一定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但由于“百姓日用而不知”，对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也许仅有直觉的感受，而缺乏理性的了解，反省中国文化独特之价值可以增进文化生命的自信，启发创造的契机，使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到更进一层的发展。（二）处在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人类文化相互冲击的时代，不能不对中西文化及其价值作一基本的认识与抉择，并对中国文化独特价值向世界作一清楚之说明，这不但利于巩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且能本于中国文化之教训向全人类提供解决全人类困境的途径。（三）际此廿世纪，交通日繁，文化交流与日俱增，西方文化一则向外扩伸，一则面临危机，正需吸取东方文明以补其短。吾人对中国文化之独特价值作一把握，当能促使人类文明之再生，也能促进人类文化之跃进。（四）对于吾人文化价值之反省亦为一文化表现之过程。吾人能对吾人文化作一正确之理解，除能增进吾人之文比意识，且能阻遏吾人及外人对吾文化之误解，避免因此种误解带来文化进步之阻力。

二、掌握研究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

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有正确的立场和方法。首先，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忠实于历史和事实，正确地进行认识和评价，不能从主观意愿或想当然出发。无根据地推测，添枝加叶；或视而不见，闭而不谈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其次，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有辩证分析的态度。世界上各民族就其文化发展而言有先后之差、快慢之别，但无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民族文化，既然能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立足，必定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各有其长处和短处。采取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再次，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成果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氛围中，把握其性质和特点，从文比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出发，进行正确的评价和总结。不能用现代目光去苛求古人，不能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最后，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本着批判地继承的精神、古为今用的原则。新文化的创造必须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为前提，而继承本身就是一种扬弃、一种创造，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

这个问题上，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外来文化也必须采取批判地借鉴的态度，本着“洋为中用”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和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三、全面了解传统文化，努力发展民族文化

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要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必须全面了解传统文化。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全面了解，首先要了解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包括诸子百家的思想；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戏剧，书法绘画、建筑工艺；神话传说；语言文字；家庭、伦理、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其次要把握传统文化的特质。关于这个问题，学者多有论述。张岱年认为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钱穆认为是“一天人，合内外”；汤一介认为是空想的理想主义，道德的人本主义，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直观的理性主义；成中英认为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哲学，内外合用的理想政治哲学，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哲学，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还有的认为是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对传统文化的特质，应在对传统文化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把握。并进而了解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如刚健有为、崇尚气节、重义轻利、当仁不让、“忧”先“乐”后、宽容达观等等。最后，要全面了解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对传统文化停留在全面了解上是不够的。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有责任为振兴中华民族、繁荣民族文化而努力，这既表现为物质生产领域、精神生产领域显而易见的创造性劳动，也表现为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对消极的旧传统旧习惯的抵制和克服；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宣传，也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勇敢捍卫；既表现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明确态度，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力行。

第二章 物质消费生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不仅仅表现在理性的形而上领域。它深深地植根于“宗族社会—农业经济”的土壤之中，并表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为人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表现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龙文化的世俗生活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了解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就不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

第一节 村落、市井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原始先民是“穴居而野处”的。自然形成的山洞，一度是他们棲居的好所在。既可避风雨，又可御野兽。大概由于具有攀枝上树的能力，并受鸟巢的启发，所以“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大约在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革命”时代，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长期定居村落开始代替游牧社会（《美》戴维·波普诺）。

在我国，黄河流域是重要的古人类发祥地，黄河流域的黄土土质，十分利于人工造穴，故尔这一地区的原始人营造穴舍而居，并一直延续至今。但在6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已发现由穴居、半穴居向土木结构房舍转化。当时有代表性的一是长江流域的（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立柱悬空的干阑式建筑，再就是仰韶文化遗址的木骨泥墙房屋。

这一时期，以农牧为主的原始先民生活安定、少有迁徙，故能够建立稳定的居住地。典型的房舍为圆形，直径4.6米，伞形屋顶用4根木柱支撑。圆垣用细木围成，草泥抹光。室内地面、墙面有的烧烤陶化，室内有烧火的坑穴，屋顶设有排烟口。住房周围，有储藏食物的窑穴，其内至今残存兽骨、鱼骨、小蚌、栗子、棒子、菜籽、小米。另有正方形、长方形大屋，供氏族成员集会、歌舞、祭祀活动之用。仰韶末期的这种房子，柱子排列整齐，木构架和外墙分工明确，建筑面积达150m²，柱面、墙面、地面抹白灰。

当时的原始村落，多选择河流两岸的台地为基础，并已有初步的区划布局。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仰韶村落遗址，居住区住房共分5组，每组以一栋大房子为核心，较小的房子环绕中间空地和大房子作环形布置。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已发掘面积南北800余米，东西200余米，分为三个区域：南面是居住区，包括46座房屋；北端是墓葬区；居住区的东面是制陶窑场，居住区和窑场、墓地之间有一道壕沟隔开。

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联的套间式半

穴居，平面成“吕”字形，内室与外室均有烧火面，是煮食与烧火的地方。外室有窑穴，供家庭贮藏之用。此与仰韶时期窑穴在室外不同。龙山时期广泛使用白灰，还发现有土坯砖。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建立、发展和鼎盛时期。此期出现了一些城市。因是王侯的居住地，所以其建筑结构上有宫殿区、祭礼场所、城墙、居民和作坊等。在奴隶社会的宗法、分封制度下，城市是有级别的（城的大小、城墙高度、街道宽度、宫殿规模）。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城市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是带着强烈的血缘色彩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星罗棋布的村落有明显的聚族而居的特征。农业社会对土地很依赖，商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农民恋土重迁，世世代代劳作、生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许多人（尤其是妇女）终生活活动范围按里计算也超过两位数字。大量存在的是一姓一村，以姓命名，如张庄、李桥、王楼、刘村、邓寨、孟集等等。外姓人来居住，常受到排挤。当然并不排除外姓人落户的情况发生，较常见的是以姻亲关系为由。比如，生活困难的出嫁女儿携子带婿住母家，甥依舅住等等。族人聚居，有天然的血缘、情感联系，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生活。如祭礼祖先，经营族产，办族学，依族规赏善罚恶等等；并且，在生产和生活中能够互相协助。

这些村庄除沿街而布的住宅，有祠堂、族学等公共设施外，还常有各种作坊、店铺。大的村镇设集市（称集、市、场、墟等），这种定期的贸易活动规模不等。在时间特征上有半日、整日之分；日日、隔日之别；亦有间3日、5日者。而且，一年之中常有二三次贸易大会，通常规模较大，延续两三天。邻近的各村镇的集市在日期上互相错开，以便于商人“赶”集经商。这种集市是因商品交换的需要，在村落、交通要道上逐渐形成的。《唐会要》卷七一载：“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载：“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这种有集市的村落常因此而命名为市、集、埠、店、镇、步，发展亦较快，成为城市的生长点。在封闭保守、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里，以集市为中心的工商业活动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补充，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和兴奋剂。

除了专门的手工业者、商人外，广大的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也是农副产品的加工者、家禽家畜的饲养者。在集市上，他们既是自产物品的出售者，又是生活、生产的必需品（如工具）的购买者。在这种情况下，村落、住宅就不仅具有棲息的意义，而且是生产的基地。男耕在外，女织在家；种植在外，加工在家；农业在外，养殖在家。宅内宅外，房前屋后，常见缝插针、加以充分利用。如畜圈、鸡舍，栽树种菜等等，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乡村房舍的建筑，有就地取材的特点，山区为石墙，平原为土墙（泥墙或土坯墙），富者用砖墙。房顶为木架茅顶（茅草覆盖或谷物秸杆覆盖），富者用瓦。传统的夯土地基，广见的长方形房体。两面坡或四面坡的房顶，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在格局上各地又有所不同。以北京为典型、广见于华北地区的是四合院式，豪富者常有多进院落，由门屋、厅堂、廊、茱；客厅、寝室、厕、厨、仓等组成，使用上分主仆尊卑，主房常作祭祀神灵、祖先之用，反映并适应宗法制度、等级观念的需要。屋顶亦有歇山与悬山，附加引檐、出厦，或转角十字出际等等。这种型制的建筑，在古代绘画（如《清明上河图》）和汉画像砖上可见到。在南方常见有凹型五间堂、一颗印、客家环型住宅；陕西和河南有窑洞式、云南有干阑式住宅。

第二节 饮食

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独具风格。源之于原始先民而不断发展的日常饮食、物质消费习俗，在文明时代形成以菜、酒、茶、点为代表并辅之以陶瓷器、银器等精美食器的东方饮食文化系统。

一、历史的回顾

原始先民因其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即使在当今，一些相对落后的民族的饮食习俗中，还能找到这种活剥生吞的子遗。大概由于森林自然火灾恩赐，原始人于偶然中发现熟食的可贵并得到了火种。古人类学家发现，生活于 170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已经使用火，北京人遗址中积灰厚达 6 米。对于以打猎和采集为谋生手段，以各种野兽、虫鱼为食的原始人来说，用火意味着饮食上的一次革命。而继之而来的第二次革命，则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出现。种植和养殖的必要在于原始先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植物及其果实、虫、鱼等都是可食的。他们为拓宽食源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中毒甚至死亡如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 70 毒的传说）。某些好吃的东西在自然界又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当他们偶然发现，植物可以人工栽培，某些禽兽可以饲养的时候，就奏响了农耕时代的序曲。大约 8 千年前，华北平原的磁山人和裴李岗人已选育出谷子，5 千年前后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后期已使用各种石制农具和石磨盘石磨棒，在黄河流域还出现了麦子和高粱等。秦岭以南，约 7 千年前，河姆渡人已培植出水稻。此后，小米和大米成为中华先民北方和南方的主食。与此同时，人们也驯养了猪、狗、鸡、牛、马、羊、猫等，并逐步采用陶器、石板、竹筒来烙、煮食物，由单纯的

《孟子·梁惠王上》。

烧烤发展到烙、煮、炖、涮等加工方法。炒制食品在金属器具出现后成为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时期，在奴隶制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饮食文化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菜蔬、瓜果、畜禽、鱼蟹，而且出现了青铜器、玉器等精美食器。特别是食品加工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尚书·说命》记载着盐已用于日常烹调（“若作和羹，尔维盐梅”）；糖、蜜也得到应用，所谓“枣、栗、饴、蜜以甘之”。酿酒和食盐一样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传说夏禹时仪狄开始造酒，又说以杜康为酒的发明人：“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周代已总结出酿酒的六个要领：“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当时酒已有澄酒、醴酒、香酒等多种。继酿酒之后，是利用醋酸菌制醋（醯）。周代宫廷有 300 多人的酿酒作坊和 40 多人的制醋作坊。在发酵业中有泡菜（菹）的制作技术和制酱技术。《周礼·宫伯》有“酱用百有二十瓮”的记载。在饮食加工中还使用葱、蒜、花椒、桂皮等佐料，在烹调加工上已达很高水平。如选料、时令、主副食搭配、刀功、调味和火候等诸方面都上升到理论上的总结概括（见于《礼记》、《吕氏春秋》等书），因而能加工出各种美味食品，今天还能在典籍中查到的如《礼记·内则篇》的周代八珍：淳熬、淳母、炮豚、搗珍、渍、熬、糝、肝膾，各有用料及加工制作方法。由于阶级分化、贫贱富贵的差别，精美的饭菜只有王室贵族、奴隶主阶级才能享用。《周礼·天官冢宰》云：“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为王室服务的饮食工作人员分 22 个机构凡 2332 人。

秦汉一统天下，封建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建立后的上升时期显示其优越性和生命力。封建帝国藉助于水利工程、铁器和牛耕发展农业生产。内部的统一、周边的拓展、度量衡的一致、物产的交流、都市的繁荣、饮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使饮食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役水而舂”并使用缣筛，制粉量大且精细，嘉峪关出土汉代画像砖庖厨图，有仕女揉面和手持托盘进奉馒头或包子的图像，说明当时已有发酵面食；河南密县打虎亭汉画像石有豆腐作坊图；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了岭南人制作蔗糖的流程。各种植物油也广泛应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有可以盛随葬食品的 38 个竹筩，能辨认的动物性食料有十几种，水果近 10 种，另外还有花椒、肉桂、高良薑、香茅草等香料。《盐铁论·散不足篇》列举西汉前期食肆中的 20 款时尚之食及民间摆酒例菜 7 款；枚乘在《七发》中列数“至味”九款；王室餐桌更是奢侈，《御览》第 229 引《汉仪注》称：“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

《礼记·内则》。

《说文解字》。

《礼记·月令》。

奴婢各三千人”。酒池肉林、玉食锦衣、歌舞升平，这些与劳苦农民的饥寒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秦汉时期有不少有关农业方面的书籍。据累计西汉时能见到的农书有 15 家（含战国时两家，余为秦汉成书）。魏晋南北朝时成批涌现食品制造、烹调、食疗等方面的著述，以《齐民要术》为最。书中既有各种作物的栽培、加工和贮藏技术，又有各种家畜家禽、鱼类的饲养、繁殖技术；在食品制造方面，书中论及精盐、饴糖、蜜饯、果汁、豆酱、芥酱、鱼酱、虾酱、肉酱、酸醋、豆豉、酒曲、酿酒、药酒、奶酪、杏酪、腊味、腌酸菜、酱八宝菜、泡菜和各种糕点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烹调上，有蒸、煮、煎、烤、酢、羹等多种技艺的介绍，并列举了近百款菜肴的名称及做法。

隋唐至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城市饮食业空前繁荣。《通典·食货典》载云：“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溢，以供商旅。”约有 400 年的历史的用茶之习，自唐代以降，蔚成风气。竟陵人陆羽作《茶经》三卷分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 10 类，涉及了栽种、采集、制作、饮法、用水、饮具、产地、轶事等，为现存最早一本系统介绍茶的知识专著。

隋唐至明清期间，传统烹调技术更趋成熟，并最终形成苏、粤、川、鲁四大菜系。

宋代市面上出现了包办筵度的“四司六局”，即：帐设司、厨司、茶酒司、抬盘司；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吴自牧《梦粱录》收罗了南宋都城临安菜式 335 款，糕点饼糍 70 多种。

清代皇帝、皇后用膳，一餐菜点百款以上。著名的清代“满汉全席”大约包含南北名菜 100 款，名点四五十种，干鲜果品及开胃醒酒之酸酱、泡菜之类约一二十种，要“三撤席”吃一整天。

烹饪大师以某一物品为主设席摆宴，如蛇宴、鸡宴等。民国初年的全羊席单，列菜式 128 款。

二、名菜、名茶、名酒、名点

中国菜最为著名的有苏、粤、川、鲁四大地方菜系，也有加湖、闽、徽、浙为八大菜系或再加京、沪为十大菜系的。除这些地方菜系外，还有寺院菜、宫廷菜、官府菜、少数民族菜等。这些菜各有特色，但又同为中国菜，有其共同风格，讲究色、香、味、型，基本材料大体一致，基本技法大体一致。器具也十分讲究，所谓“美食不如美器”，一款成菜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鲁菜素有“北方代表菜”之称，始于春秋，历经汉唐，元明清时为宫廷御膳支柱，以爆、烧、炒、炸见长，以清、鲜、脆、嫩著称，讲究清汤和奶汤的调剂，如九转大肠、糖醋黄河鲤鱼，德州扒鸡等；川菜有千年以上历史，以小煎、小炒、干烧、干煸见长，以其味多、广、厚和麻辣著称（喜用三椒及姜），如回锅肉、宫保鸡丁、麻婆豆腐等；苏菜擅长于河鲜，始于吴人，1000 多年前，鸭已成为金陵美食，苏菜味兼南北，趋甜、清爽，擅长炖、焖、

蒸、炒，重视调汤、保持原汁，如烤方、水晶肴蹄、清炖蟹粉狮子头、金陵丸子、金陵板鸭等；粤菜源于西汉，善烹制鱼虾野味（尤其是蛇），油重味咸，擅长爆、炒，如豹狸烩三蛇（龙虎斗）、片皮乳猪、潮州冻肉等。

造酒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技术不断发展，品种繁多。诸如白酒、黄酒、果酒、药酒、露酒、蒸馏酒、酿造酒、配制酒；高度酒、中度酒、低度酒；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米香型等。贵州的茅台酒、董酒，山西的汾酒、竹叶青、剑南春，四川的泸州老窖特曲，陕西的西凤酒，湖南的绍兴老酒等均为我国名酒。茅台酒有“国酒”之称，汾酒产地杏花村海内闻名。名酒常常与人名诗相联系，如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李白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曹操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等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国家。茶，古名荼、茶茶或茗。华佗《食经》云：“苦茶久食，益意思。”中国茶有红茶、绿茶、花茶、乌龙茶、紧压茶等种类。红茶为经发酵制成的茶，因汤色、叶底均呈红色，故名，为传统产品，如安徽祁红，云南滇红，湖北宜红及川红、闽红等。我国盛产的绿茶为不经发酵制成的茶，因汤色和叶底呈绿色，故名，分炒青、烘青、蒸青或因产地而异名，比较有名的如杭州龙井、旗枪，江苏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等。

我国有久负盛名的各种风味小吃、名点等，如面食中的饺子、馒头、刀削面、元宵、粽子、月饼、天津包子（俗称“狗不理”包子）、羊肉泡馍；菜类中的北京烤鸭、涮羊肉、豆腐、五柳鱼、东坡肉、叫花子鸡等。

第三节 服饰

服饰，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原始先民一度过着赤身裸体的生活。服饰的起源，诸说纷纭，有御寒说，遮羞说，求美说，性竞争说等。有论者认为，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服饰“不再仅仅具有抵御风寒的作用，而体现了人类装饰自己的欲望”。但是，我们注意到尚若“服”、“饰”分言，在原始人和现在的落后部落里，是饰先于服饰重于服的。因此，原始服饰首先是出于审美和性竞争的需要，其次是御寒。至于羞耻之心，则是更晚的事了。

在丝织物发明以前，原始先民以树叶、树皮、兽皮、兽骨、兽角、贝壳、鸟羽、象牙、植物果实等为服饰，并涂上颜色。例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有用鱼骨和贝壳做成的首饰，并且在穿孔上涂以红色（氧化铁粉）。还有经过磨制染色钻孔的小石珠，磨光的鹿骨，刻纹的鸟骨。同时发现的一枚骨针，长 82 毫米，圆滑尖锐，有刮挖而成的小针眼。可用于缝制兽皮衣服。

在距今 7000 ~ 5000 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掌握了纺织技术。人们剥

取野麻的纤维，用石制、陶制纺轮捻成线，然后织成布。在距今 7000 余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出土了红陶纺轮，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陶纺轮和原始织机零件。还有合股的苧麻纱实物，在一个牙雕小盅上刻有四条蚕纹。在距今 5500 年的河南省青台遗址出土了绞经罗纹织物，距今 4800 年的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丝帛、丝带、丝绳等纺织物。古人称上身所穿为衣，下身所穿为裳。衣裳起源何时？在甘肃辛店出土的彩陶上有早期的服饰上衣下裳的形制雏型。直到商周时期，多为此制，如元端、襦裙等（在春秋以前，男女均穿裙）。春秋战国以后有衣裳连属制，如深衣、袍服。辛店出土的彩陶上人物中，为首一人头戴帽，所着衣裳上下相连，腰束带，但无袖，似乎是深衣的前身。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生产丝织物的国家。传说黄帝之妻嫫祖为养蚕治丝的发明者。到夏商周时期，麻、丝、毛等纺织原料的生产已有较大规模，缫、纺、织、绣、染等技艺逐步提高。铜铁已被用作以木质为主的纺织机具的零部件。夏时有不少邑镇以织品闻名，如薄之纂组，朝歌之罗绮，襄邑之织锦，齐之纨（齐郡以世代刺绣著称）、鲁之缟等。西周至战国时期，丝织物有纱、绡、纨、缟、缣、罗、袷、纁、绋、锦等品种，考古发现了多彩提花的高级丝织品两色锦和三色锦。纺织、印染、刺绣的发展为人们的服饰提供了条件。

元端为夏、商、周三代服式。天子服之以燕居，诸侯服之以祭宗庙，大夫及士则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因幅长袂广皆 2 尺 2 寸，色玄又正幅不削，故名元端。深衣用白麻布制作，上下相连，宽大，续衽钩边、方领、长度及踝。各种场合、阶层，不分男女皆可穿用。《礼记·深衣篇》云：“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采也”，“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连属，下裳用六幅，每幅又裁之为二，共 12 幅“以应十有二日”。延至汉时，有“曲裾深衣”、“绕襟深衣”，剪裁采用单幅袍制，而且妇女也可穿着。长沙马土堆一号汉墓出土保存完好的衣物 58 件，属服饰类的有 27 件，计有丝锦袍 11 件，夹袍 1 件，单衣 3 件，以及手套、裙、鞋、袜、香囊、镜套、竿衣、丝巾等。印花敷彩纱锦袍和绕襟曲裾袍代表了汉代楚地服饰特点。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身长 128 厘米，袖长 190 厘米。包括领和两个袖口镶边在内重量才 49 克。素纱为单色、纤细、方孔、轻盈的平纹织物。《周礼·天官·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袷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纱）。素纱为王后的内衣或夏天穿的高贵服饰。

袍在民族服饰地位十分重要，是不分上衣下裳的长服，战国时袍不为正服，秦代以袍为贵，男女分别以革带、丝带系之。西汉时至为普及，东汉时以袍为朝服。唐代以紫、绯、绿、青区别官职高低。士子未入仕着白袍，帝王用黄袍。清代男子袍衫外套以马褂、马甲，或以淡色腰巾系之。

图表 21 历代主要服饰

朝代	公元	男子服饰	女子服饰
西周	前 11 世纪 ~ 前 771 年	戴高冠，穿大襟衣，腰佩大带，并饰有褰膝。	梳髻，插对笄，穿矩领窄袖衫，腰下饰有褰膝。
东周	前 770 ~ 前 256 年	戴高冠，穿曲裾袍服。是为深衣。	梳双髻，穿窄袖短衫。
秦代	前 221 ~ 前 206 年	梳髻、穿三重衣，腰系革带，带端缀有带钩，腿裹行藤。	脑后垂髻，穿曳地长袍，领袖各叠三层，名三重衣。
汉代	前 206 ~ 220 年	戴梁冠，穿大袖曲裾或直裾袍，耳边饰白笔。是为文官服饰。	梳髻，插珠玉步摇，袍服垂地，衣襟盘旋而下，是为绕膝深衣。
魏晋	220 ~ 420 年	笼冠，穿大袖袍衫，褒衣博带，腰系围裳。	梳假髻，穿窄袖衣帔子，下穿长裙。
南北朝	420 ~ 589 年	戴小冠，穿袴褶，裊裆，裤管膝盖处各缚一带。	梳飞天髻，穿对襟大袖衫，下穿长裙，足穿笏头履。
隋代	581 ~ 618 年	戴介帻，穿盘领大袖袍，裊裆衫。	梳平髻，穿窄袖短襦，长裙曳地，裙腰系在腋下。
唐代	618 ~ 907 年	裹软脚幞头，穿圆领窄袖衫，足穿六合靴。	梳螺髻，穿窄袖短襦、半臂，下穿衣裙。肩上搭有披帛。
辽代	947 ~ 1125 年	髡发，穿圆领窄袖大袍，足穿高筒皮靴。	帛巾扎额，穿左衽窄袖长袍，腰间系带，下垂过膝。
宋代	960 ~ 1279 年	戴长脚幞，头穿圆领大袖袍衫。是为官服。	梳高髻，戴高冠，穿窄袖对襟背子，下穿长裙，足穿弓鞋。
元代	1271 ~ 1368	梳辮，戴瓦楞帽，穿窄袖大襟长袍，足穿革靴。	戴顾姑冠，穿大襟长袍，足穿革靴，为贵妇服饰。
明代	1368 ~ 1644 年	戴乌纱帽，罗盘领袍，袍之前后缀有补子。是为官服。	梳双髻，在宽袖衫，长裙，外着比甲。
清代	1616 ~ 1911 年	戴暖帽或凉帽，穿马褂长袍，袍用马蹄袖。是为官服。	梳旗髻穿旗袍，外着琵琶襟马甲，足穿花盆底旗鞋。
近代	1840 ~	戴呢礼帽，穿窄袖对襟马褂，长衫，足穿布鞋或皮鞋。	烫发，穿改良旗袍，戴耳环、手镯、戒指等饰物。

在女装方面，上襦下裙为基本样式，从战国直至明清。秦汉时，上襦很短，只到腰间，裙子极长，下垂至地。隋唐时，裙腰高束至腋下。唐裙色彩艳丽，明代趋于浅色，乃至素白。

瞭褶（裤褶）原为北方民族骑马射猎之服，汉末传入中原，南北朝时盛

行于民间并入宫廷。上身之褶色赤，下身之瞭色白，配套穿用。内地多以丝织物（如绢）为材料。如“蜀锦瞭褶”、“绣瞭褶”、“绫罗瞭褶”等。

古代服饰常显示身分。袞衣为帝王百官礼服，与冕冠、舄等配套，以颜色，纹饰等区别尊卑高下。

庶民穿布衣，穿兽毛或粗麻织物做的褐（短衣）。《盐铁论》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皀而已，故命曰布衣。”

清代满族妇女之旗袍经改进变化后在近代颇为流行。与此同时，男装因受西方影响而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相杂。辛亥革命后，中山装作为男装一度在政府官员和青年学生中流行。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着中山装。

第四节 节日的物质消费习俗

传统节日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致使我们的传统节日不仅数量多，而且节日的习俗、活动丰富多彩。这些节日与其他民族的宗教神话不同的是，更具有人世的意义，但其中也常有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节日中，比较重要的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日和“腊八”节等等。

一、春节

春节，是阴历正月初一，又称过“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一个。年为岁首，唐虞时有“载”之称，夏商时有“岁”之称，周由岁改年。“年，谷熟也”，“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甲骨文之“年”是果实丰收的形象，有丰收的含义；金文中的“年”，也是谷穗成熟的样子。过年，一方面是庆祝丰收，另一方面是祈祝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人康乐。当是时，春气萌动，又值春耕前之农闲时，故尔是休息、娱乐的好时光。

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方面一度居世界领先地位。过去一直延用的太阳历，又称夏历，因始于夏而得名。该历以朔日子夜为月的开始，“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之为首。”可见正月初一不仅是一月之首，而且是一年之首，故古时有元日、元旦、元正、元朔、新春等多种称呼。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也有不以正月初一为岁首者（商：12月1日；周：11月1日；秦：10月1日）。

《说文解字》。

《谷梁传》。

春节期间的活动多与农事有关。如测天候，卜丰歉，舞龙以求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残害人畜庄稼的怪兽；挂桃符，帖春联，使帖“福”字均取其吉祥，亦添节日喜庆色彩。现一般认为，孟昶所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为中国第一幅春联。“福字”，据说与姜太公、朱元璋等人有关，倒贴则取其“福到”之意。晋朝增添的放爆竹一习，延续至今，是春节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据说是为了驱赶每年腊月三十日才出来一次的怪物：“年”。腊月三十日（或二十九）为除夕，是日十分热闹，尤其是人们不停地忙碌（忙年），如包饺子，蒸年糕，准备各种酒菜，贴门神春联窗花等等。当天晚上，举家彻夜不眠，所谓“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还要点烛燃香，摆放供品，举行隆重的祭神祭祖活动。这天一般要全家团聚。初一天亮后即互相“拜年”，互相祝福。此俗至少始于宋而盛于明。当晚辈给长者拜年时，长者常给子女一些“压岁钱”，取一年到头不缺钱花之意。北方过年要吃饺子，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食品，至少有1600多年的历史。

过年，除夕和初一最是热闹，而腊月二十三日则是前奏。是日祭供灶神，求其“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这一天又称为“小年”。从这天开始要打扫卫生，置办年货，准备食品衣物。春节的节日气氛从这一天开始一天比一天浓重。在今天，春节仍然是我国人民的重要节日，不仅汉族，各少数民族过此节也很隆重，而且各有自己别有情趣的内容。海外华人对此节亦十分重视。不过，时下的春节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那么多的封建迷信色彩了。

二、元宵节

阴历正月十五日为一元复始的第一个月圆之夜，称上元节，这天晚上叫“元宵”、或“元夜”，因始于东汉，兴于唐的观灯习俗，所以又叫“灯节”。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之一是说西汉文帝在勘平诸吕之乱后登基，勘平之日恰是正月十五。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汉文帝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出宫与百姓同乐。

元宵节之灯用材广泛、造型各异、五彩缤纷、巧夺天工。诸如走马灯、龙灯、动物灯、东舆灯、更有楼台殿阁、神话人物故事等。扎彩灯成为中国民间工艺的一个重要门类。彩灯上常有文人作的诗画及谜语，放灯猜谜别有一番乐趣。

过春节时的舞龙舞狮、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等在元宵节再度进入高潮。这些活动和彩灯一起给人以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古往今来，吸引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咏叹歌吟，留下不少佳作。

元宵节还要吃汤圆（又称元宵），这是一种用糯米粉包上馅做成的球状

食品，其馅由糖、核桃仁、玫瑰酱、青红丝（桔皮做成）等组成，美味可口。元宵节食汤圆，由来已久，唐文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着元宵节有吃“汤中牢丸”之习。宋代则多有描述了。明清时，元宵制作已很讲究，并有因制作和售卖元宵而闻名者。

三、清明节

《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到指乙，为清明。”可知清明最初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阴历三月上旬，阳历4月5日或6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值些春意盎然的大好时光，人们纷纷外出踏青、放风筝，或进行荡秋千、蹴鞠、拔河等体育活动。清明在农事上有重要意义，是春耕春种的开始之期。

清明节扫墓、行墓祭，与寒食节有关。寒食节与清明节同日，历史上个别朝代略错过两三天。寒食禁火，源于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忠臣介子推割己股相啖，重耳为国君后欲封赏隐居山中的介子推，不得已放火烧山逼其出，然子推与母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责己人，令每年是日不得生火做饭。

古人留下不少关于清明的诗歌，比较著名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后人把此诗断句为词或删节成五言者，传为趣话。

四、端午节

阴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这是我国一个十分古老的节日。西晋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端者，初也。”原为端五，据说唐玄宗八月五日生辰，避五之讳，改“端五”为“端午”。

端午节最重要的活动是吃粽子和划龙船。通常解释为因屈原投江的搭救活动而起。

关于粽子，《说文解字》云：“粽，芦叶裹米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这样的描述：“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饲蛟龙，以免其咬食屈原躯体。又说为‘屈原以五月初五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祭之’。后来为防鱼蛟与屈原争食，故包成菱角状投入江中。”

关于划龙舟，进北朝时的《荆楚岁时记》列因有三，其一谓“屈原投汨

《易通挂验》。

北宋梁人吴均：《续齐谐记》。

罗日”，“人伤其死，并将舟楫以拯之，今竟渡是其迹”。又有云划舟寻找屈原尸首。

五、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因八月为秋季之中，十五日为八月之中，故曰“中秋”。秋季之三个十五分别称为“孟”、“仲”、“季”，故中秋又称仲秋。中秋时节，太阳光直射月球朝地球一面，又兼空气清新干爽，月色也就分外明亮，中秋赏月祭月，古有此习。《唐书·太宗记》云：“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是明确记载。但“中秋”一词，早在《周礼》中就出现了。

中秋节的应时糕点是月饼，又称宫饼、团圆饼。月饼一词见于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但这种圆饼状食品的出现则更早。较早时，秦汉在中秋用糍粑饼敬老。唐代宫廷中有“宫饼”。五代时民间有在中秋节售卖用桂圆、莲子、藕粉等做成的圆饼状糕点者。此后，代代相因，形成地方风味如京式、广式、苏式、潮式、滇式等。

中秋之夜，民间通常在庭院中置几，摆放月饼、石榴、苹果等，全家人一齐赏月，取团圆之意，故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大抵因月之圆缺比于人事，古人多有咏叹。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起，月是故乡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的《水调歌头》，均是千古绝唱。另，“莫做江上舟，莫做江上月，舟载人别离，月照人离别”之句，亦使人一咏三叹。

中秋节与“嫦娥奔月”、“玉兔、吴刚、桂树”等故事联系起来，更富浪漫色彩。

六、重阳节

阴历九月九日，俗称“重九”，为重阳节。《周易》以九为阳数，两九相重，故曰“重阳”。重阳节时，秋高气爽，宜登高望远、饮酒赋诗。唐人王维留下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名篇，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阳登高插茱萸之习，据说起于东汉，《续齐谐记》载，汝南人恒景师从费长房，某日长房告曰九月九日恒家有难，示嘱家人制香囊装茱萸以避邪灾、并于重阳日登高山，饮菊花酒，因免于灾。后来，“重九登高，效恒景之避灾”相沿成习。但重九为节，则早在战国时已成风俗。屈原《远游》诗有“集重阳入帝宫兮”之句。《风土记》也有“重阳相会，登高饮酒”以畅秋志的记载。

七、腊八节

阴历腊月初八为腊八节。早期与腊祭有关。是古代在岁末祭祀祖先，祭拜众神，庆祝丰收的活动。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一个月（腊月）举行。祭祀之日为腊日。夏朝称“嘉平”，商朝称“清祀”，周朝称“大腊”。至迟在南北朝时，腊日已固定在腊月初八。当时腊八有“击鼓”（腊鼓）吃粥的习俗。腊八粥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延袭至今。据说该粥与佛教有关。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绝欲苦行，因劳困昏倒在路，牧女以杂粮粥救起，元气顿复，后经修行，于十二月初八日得道成佛。以后，佛家于腊月七日彻夜熬制由各色米、豆、果组成的粥，八日敬佛诵经，各寺院不仅自家食用，而且广加馈赠。后来，上至宫廷、官府、下至都市、乡村，皆仿效之。苏东坡有“今朝佛粥更相馈”句，元人孙国敬《燕京游览志》云：“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以米果杂成之”。雍和宫有径2米、深1.5米，一次可放上千米的大铜锅。清代每年腊八盛典，熬粥、供粥、献粥、舍粥，甚是隆重、热闹。

第五节 传统物质生活习俗与现时代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传统的物质生活习俗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农业文明的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征。在工业时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受到强烈的撞击，发生和继续着必然的变迁。

一、农村社区建设

我国的自然村落有形成发展的随意性，十分散乱，表现在村落的分布上、村落的整体和分立的住宅建设上。由于集生产、交换、消费于一体，长期以来肮脏、混乱的状况不能改观，井、厨、厕邻近，人畜同院同舍，车具、作物秸秆乱堆乱放，自然排污，农家肥生产在村内进行，蚊蝇出入居室，农民既没有讲卫生的条件，也没有讲卫生的习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不少人的口头禅，“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的”是人们反对改易的口实；农村兴土木建宅舍时，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看风水、择吉日。时有把家庭中的不幸与荣福归之于宅舍的建设。有的反复拆迁，劳神丧财；对深宅大院的追求使村庄对土地的吞食严重，人满为患，土地危急已不是耸人听闻；人们孤陋寡闻，闲暇生活、精神生活贫乏。典型的生存型消费，缺乏高格调的追求。上述状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有所改观，但彻底改变则还需要时间。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需适应现代化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合并自然村落，发展排房化、楼房化的统一规划的乡镇，规划中一定要有必要的卫生、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场所和设施。

二、饮食的现代化

我国广大人民的饮食，当前处于温饱型阶段，以粮食、蔬菜为主，面食为主，肉蛋奶偏少、付食偏少。但热量基本满足人体及活动的要求。从前景上看，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可以建立良好的饮食结构；我国人民饮食以粮食为主，下一步抓好蔬菜、瓜果的种植、供应工作，适当增加肉蛋奶的比例。将可防止发达国家的肥胖症，心血管系统疾病。我国的食疗传统有很好的开发前景。不仅日常饭菜制作时可制作一些食疗食品，而且可商品性开发有关的成品和半成品。随着生活消费水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我国人民的人均占有粮、肉、蛋、奶、鱼在本世纪末可分别达到 425 千克、25 千克、12.5 千克、25 千克、10 千克。传统的烹调技艺日益普及到家庭日常饭菜和节日饭菜制作之中，满足人民越来越高的美食需求。

传统的烹调技术在开放社会、商品社会、第三产业长足发展的社会有很好的商业性开发前景，中国饭菜不仅受到来华旅游、访问的各国人士的青睐，而且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当然，我们必须进一步克服中国人在吃饭上花大钱和占用时间太多的陋习，提倡节约，适当发展便餐、快餐以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还要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掉不合理的烹调技术，去掉不科学的添加剂，力求减少营养损失，力求营养成分合理，减少加工过程中的有害物质；我们还要积极开发、利用现代化新炊具和食品加工、储藏手段。如煤气，不锈钢，铝制炊具，各种食品加工机器和加工技术，清洗和消毒机器的技术，冰箱储藏技术，食品保鲜技术，新型包装等等；还要发展新的食品种类。

三、传统服饰与现时代

西方文明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冲击表现在服饰上是西装革履（西式皮鞋）的出现。时下，中国城乡的人们尤其是青年，穿西装已很普遍。但传统服饰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和抛弃。

在广大农村穿传统服装的人占很大比例。它有制作简易，穿着舒适的优点。

中式男女上衣，改良旗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在城乡都会有人喜欢穿着，无论长幼。

中西式服装可以互相借鉴，如旗袍去掉中式领、襟、扣。有多种式样新颖、活泼的变化。而且，中西式服装可混和穿用，如中式上衣配西裤或各种裙装。

中国的丝绸加上传统的染色、巧夺天工的刺绣工艺，为人们提供了上乘的衣料。

传统的服饰及加工方法为现代服装设计所借鉴，流行时装上时有传统特点的点缀、饰件。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服装也将向多样化发展，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情趣。在今天，一身打扮、长年不变的情况已很少见。在服饰上，人们已备有冬装夏装，内衣外衣，礼服便服，工作服运动服，浴衣，晚装等等。根据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场合选穿不同的服装，已为所人们注意。古代服装的一些型制，可以进行适当的开发、借鉴，设计出适合特定职业、场合、年龄的人们穿着，估计古典服饰会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四、做好传统节日的移风易俗工作

节日增添了人们生活的欢乐和喜庆气氛。在现时代，节日活动采用了许多新科学技术手段。如广播电视，礼花，机动彩车，有电动机械装置和光电设备的彩灯等等，活跃了节日生活、渲染了节日气氛。但传统节日中还有一些陈规陋习，需要加以克服。第一，要制止节日期间的封建迷信活动，如敬神上供，烧化纸钱等等。第二，要改变节日期间大吃大喝的风气。节日期间在衣食上有些适当花费是可以的，但不宜过分铺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第三，节日期间不可给子女过多零花钱（如压岁钱）。因为这一方面会加重家长、长辈的负担，另一方面又会使孩子养成坏习惯。第四，节日期间要防止一些人聚众赌博。第六，节日期间燃放鞭炮、烟花应加以节制，近年来，我国人民在这方面花钱太多。而且，容易造成爆炸事故、火灾，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且造成环境污染。

第三章 自然科学技术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许多成就，都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在技术发明方面，我国以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四大发明”著称于世。这些成就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勤劳、勇敢、奋斗的结果，是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龙文化”中闪光的一页。

一、著称于世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并称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推动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指南针的发明年代很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的指南针是用天然磁石琢成的，样子像一只勺，底圆，可以在平滑的“地盘”上自由旋转，等它静止时，勺柄就会指向南方，称为司南。北宋初年的指南针，已经是天然磁石摩擦钢针制得的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根据见闻写道：“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磁偏角的最早记载。直到19世纪电磁铁出现以前，几乎所有的指南针都是采用这种人工磁化法制成的。最初，人们使用的指南针可能没有固定的方向盘，南宋时期发展成磁针和方向盘联成一体罗经盘或称罗盘，方位是24向。盘式由方形演变成圆形，只要一看磁针在方向盘的位置，就能确定出方位来，罗经盘的出现，无疑是指南针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指南针，作为一种指向仪器，在我国古代军事上、生产上、日常生活中，尤其在航海事业上都起过重要作用。

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渔网等废旧麻料制成的植物纤维纸，但比较粗糙，不便书写。公元2世纪，东汉的宦官蔡伦，在西汉造纸的基础上，增添了用树皮、特别是楮皮造纸，扩大了原料来源。并凭借着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监制组织生产了一批良纸，于公元105年献给了朝廷，从此造纸术在国内推广了起来。经过不断改进，在公元2到4世纪，制出的纸张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基本成了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东青卷》中，关于竹纸和皮纸的记载，可以说是具有总结性的叙述。书中还附有造纸操作图，是当时世界上关于造纸的最详尽的记载。

我们的祖先发明火药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古代炼丹家们把硝石、硫磺、木炭掺合在一起炼药时，发生了猛烈的燃烧，经过反复实践，他们认识到这

三种物质混合后遇火而燃的性能，从而发明了火药。

从唐朝末年起，火药开始应用在军事上。唐末宋初人们已经制成火药箭了，随后又在石炮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炮。火药武器的出现，反过来推动火药的研究和大规模生产。北宋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1044年）里，不仅描述了许多火药武器，还记载了当时三种火药配方，已经很复杂了。北宋末年制造出“震天雷”是一种铁火炮，在明代人们还创造了早期的自动爆炸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利用火药燃烧喷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力，制成把箭头射向敌方的火药箭，是一种雏形的两级火箭。

火药不仅在军事上，往生活和生产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南宋时即用火药制作爆竹和焰火，以后又用来采石、开山和狩猎。在现代社会里，火药更是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

印刷术发明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7世纪的初唐时期，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是在整块的木板上刻字进行印刷，一次就可印出几百、几千部书，但仍然很费工。宋代平民毕昇，生活在我国雕版印刷的全盛时代（公元1041~1048），他通过长期亲身实践，在世界上首先创造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是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了松脂、蜡、纸灰等，铁板四周置一铁框，铁框里排放用胶泥刻的活字，排满一铁框就是一版，接着在火上烘烤，待脂蜡融化，用平板把版面压平，等铁板冷却，活字固定后即可印刷。用这种方法印刷数百到几千书籍“极为神速”。毕昇发明的活字排印方法和现在盛行的铅印排字原理基本相同，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活字印刷的另一发展，是用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公元十五六世纪，铜活字已正式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一带。到了元代，农学家王祯创造木活字成功，他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简单的机械，增加排字的效率。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发明闪烁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辉。

二、天文、地理

我国古代天文学发达为世所公认。早在4000年前，就有可考的文字星象记载。有关对彗星最可靠的记录开始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鲁文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13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天文》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在申编写的，共八卷，被后人尊称为《石氏星经》。从流传下来的《天文》片断，可以辑录出一份石氏星表。其中，有28宿距星（每一宿中取作定位置的标志星叫做这一宿的距星）和其它一些恒星共115颗的赤道坐标位置。石氏星表，是后世许多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诸如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都要用到其中28宿距度的数据。这是我国天文历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可以确定地球的大小，子午线是地球的经度线。唐朝

僧一行测量数据的误差虽然稍大，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开创了我国实际测量认识地球的通路，为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

在历法方面，我国是最先发明用闰月的方法调整阴历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创立阴阳合历的历法体系。春秋末年，我国使用的四分历，以 365.25 天为一年，是当时世界上历法最精密的数值。

元代的郭守敬，在前人观测日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叫做景符的仪器，用来解决日影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郭守敬根据自己多次精密测定的冬至时刻的结果，并且利用历史上从祖冲之大明历以来的 6 次冬至时刻观测资料，证实了 365.2425 日是历史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数据。这个数据的使用，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欧洲的著名历法格里高历，也是采用这个数值，但要比统天历大约晚 400 年。

我国还制造了浑仪和简仪用于天文观测。最早的浑仪大约在战国时代，结构比较简单，是由两个圆环组成的。东汉科学家张衡和唐朝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先后对浑仪进行了两次大的改进。东汉时的浑仪已经比较完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之一。

元代的郭守敬，在宋代沈括等人基础上，于 1276 年，创造了测量天体方位的新型天文仪器——简仪，简仪与浑仪的主要区别，是取消了白道环和黄道环，并且把地平坐标和赤道座标分开安装成为两个独立的装置——一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因为每个装置都很简单，故称“简仪”。简仪的设计制造精密、在赤道环内部固定着一个百刻环，用来承托赤道环，使它旋转方便。百刻环等分成一百刻，每刻又分作 36 分，这是古代任何天文仪器都没有达到的。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治水历史和丰富的地理知识，《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作为《尚书》中的一篇，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乃地理名著。《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

地图是表达和传播地理知识的重要手段。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三幅西汉地图，北宋末年上石的《九域守令图》为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古代文献中，有关地图的史料很多。西晋的裴秀（公元 233—271 年）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18 篇时，提出了绘制地图必须遵守的几项原则，明确规定：“制图之体有六”，即首先要有反映地区长宽大小的比例尺；其次要确定彼此间的方位关系；第三要知道两地之间的人行路程；第四、第五、第六是说人行的路程有高下、方斜、迂直的不同，必须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就是说要因地制宜，求出地物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这几项原则虽然是前人在实践中已经做到了的，但是裴秀把这些宝贵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对我国传统制图学理论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继裴秀之后，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飞鸟图”和取得“鸟飞之数”的方法。另外，我国研究相宅相墓的堪舆学虽有迷信色彩，但也包含一定科学内容。

我国记录地震开始很早，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有帝舜时期“地坼及泉”，夏桀末年“社坼裂”的现象，可能是关于地震的最早记录。

东汉，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观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安置在洛阳，观测到公元 138 年陇西发生的一次 6 级以上的地震，开创了人类使用科学仪器观测地震的历史。

三、数学

我国古代的许多数学家曾经写下了不少的著名数学著作。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因为有了这些古算书而得以流传下来，如《算经十书》，是汉、唐一千多年间的十部著名数学著作，它们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缉古算经》和《缀术》。

十部算书以《周髀算经》为最早，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 1 世纪。这是天文算学著作，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书中记载了用勾股定理来进行的天文计算，还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九章算术》是 10 部算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全共分 9 章，一共搜集了 246 个数学问题连同每个问题的解法，分为 9 大类，每类一章，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解各种面积和体积问题的算法，以及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各种问题。《九章算术》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代数方面记载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求解一般一元二次方程（首次系数不是负数）的数值解法。有整整一章是讲述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出 1500 多年。同一章中，还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

《算经十书》的其余几部书，也记载有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例如《孙子算经》中的“物不如数”问题（一次同余式解法），《张丘建算经》中的“百鸡问题”等等，都比较著名。《算经十书》用过的数学名词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正负、方程等等，一直沿用到今天。

我国古代数学，以计算为主。其中，十进制制记数，曾被马克思称为“最妙的发明之一”。筹算以算筹作工具，摆成纵式和横式，按纵横相间的原则，表示任何自然数，从而进行加、减、乘、除、开方以及其它的代数计算。而珠算是由筹算演变而来的，元末明初已经普遍应用。

我们知道在解决求圆周长、圆面积、球体积等类问题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圆周率，圆周率“ π ”可以表示成无限不循环小数。南北朝时，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就把圆周率推算到 $3.1415926 < \pi < 3.1415927$ ，不足近似值和过剩近似值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这在科学不很发达的古代是一种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工作。因此，圆周率的理论和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直到 1000 多年以后，15 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和 16 世纪法国数

学家才打破了祖冲之的纪录。在求圆周率的同时，祖冲之还确定了圆周率的两个近似值：约率 $= \frac{22}{7} = 3.14$ ，密率 $= \frac{355}{113} = 3.1415929$ ，比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兹早了 1000 多年。因此，一些人建议把 $= 355 / 113$ 称为“祖率”以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

南宋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自幼喜好数学，他经过长期积累和苦心钻研，于公元 1247 年写成《数书九章》。其中，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一术”和一元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在西方数学史著作中，一直称求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为“中国剩余定理”。

四、医学

中国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祖国医学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其中，《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十分重要的两种，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经考证早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公元前 3 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 18 卷 162 篇，包括《素问》和《针经》各 9 卷。《黄帝内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针灸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反映了中国整体思维模式和“一天人，合内外”的文化传统，不仅视人体为一整体，而且视人和天地自然为一整体，互感互应不可分割。因此该书不仅具有医学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文化价值。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编写的，成书于公元 3 世纪初。《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病情，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辩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方法。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为中医临床的辩证施治奠定了基础，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辩证的思想方法，形成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医疗体系。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是在病人身体的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直接调整人体机能，增强抗病能力，并引起机能的传导作用的方法，前者称为针法，后者称为灸法。它结合中医特有的经络学说，是中国古代医学的一项重要成就。200 多年前，我国医学家就对针灸的临床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在周代编写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二书中，除记有在经脉循行路线上的

各种病痛、痉挛、麻木等身体局部病状以及眼、耳、口、鼻等器官症状外，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如烦心、恶寒等，都是用灸法治疗的。我国历代医家还把针灸疗法的工具和技术方面作了不少改进。

中药，是中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对中药有了一定的认识。大约到汉代，我国就出现了一本专讲药物的书《神农本草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明代著名科学家李时珍（公元 1518 ~ 1593 年），通过毕生努力，深入实践，访采四方，阅书 800 余种，终于著成举世瞩目的《本草纲目》。该书成于 1578 年，共 52 卷，190 余万字。记载药物 1892 种，比以前新增 374 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 1100 余幅，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全面总结了在它以前的我国药物学的巨大成就，首创了把药物的生态、形态、特性和药物应用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品种，对我国以及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它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我国的外科医学，在周代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已有专科医生出现，公元 2 世纪，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就成功地使用了他发明的中药麻醉剂“麻沸散”，进行腹腔外科手术。公元 16 世纪的肯堂和外科医家陈实功，还曾成功地做了难度很大的落耳再植和断喉吻合术等。

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公元 1247 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五、农学、水利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发达的农业、悠久的农业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理论，出现了不少在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农书。

北魏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533 ~ 544）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农书。全书正文 10 卷，92 篇，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记叙详细正确，系统地总结了公元 6 世纪以来，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积累的大量知识。有许多项目，比世界其它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三四百年，甚至一千多年。

元代《王祯全书》的《农器图谱》是一个创举，306 幅图，大部分是当时实物写真，有许多今天还在使用。“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王祯所创作的，他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方便，非常实用。

《农政全书》是明朝徐光启（1562 ~ 1633 年）所著。全书 60 卷 12 目约 70 万字，内容比以前所有的农书都要全面。它对农业生产各个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特别是对于蕃薯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作了重点介绍；对屯垦、水利及备荒三项作了系统的叙述，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农书。

我国古代有不少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设计水平也

很高，证明当时掌握的水文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

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灌县附近岷江上的“都江堰”，是公元前 250 年由李冰父子率领群众修筑的。都江堰由分水“鱼嘴”，金刚堤、“飞沙堰”和“宝瓶口”等项工程组成。筑好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约 300 万亩良田得到灌溉，至今仍发挥巨大作用。另外，楚安丰塘（公元前 16 世纪）、秦灵渠都是古代著名水利工程。汉龙首渠使用“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易崩塌的商颜山，使近 60 万亩盐碱地变成良田。

我国开凿运河始于春秋，隋代以大规模开凿运河著称。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航行运河。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全长 1794 公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六、机械

我国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播种机械。汉武帝时，在前人一脚耩和二脚耩的基础上制成了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耩，能一次把开沟、下种、覆盖的任务完成。现代最新式的播种机的全部功能也不过再加上压实工序。

龙骨水车，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农业灌溉机械，东汉末年发明。最初是利用人力转动，后来以畜力、风力和水力作为动力。利用流水作动力的灌溉机械，是元代时机械制造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人们利用自然力造福于人类的一项重大成就。

我国宋代，由苏颂领导下制成的“水运仪象台”（1088~1092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是把动力机械和许多传动机械组合在一个整体里，通过一组横杆装置和齿轮系实现协调地自动运转，使它经常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和天体运动一致。它既能演示天象，观测天象，又能自动计时、报时，其中的擒纵装置比欧洲类似发明早约 600 年，“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我国的冶炼技术至迟始于春秋中期，战国时已有可锻铸铁，并得到球墨铸铁。百炼钢作为一种炼钢工艺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是在块铁渗碳后复锻打的基础上，伴随着炒钢而发展兴起的。魏晋时期的灌钢法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钢方法。

我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由于长期封建统治，使广大人民的聪明才智几千年来并没得到充分发展，此间科学技术上有过特殊贡献的学者、技师和劳动人民常常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他们名虽不传，但功绩是不朽的。

第二节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与 技术发明向西方的传播

英国人李约瑟，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欧洲，特别是在 15 世纪以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2000 年来，我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方式的交往，不断地传播到西方。这些先进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对西方的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在数学领域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明中叶以前，在数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我国古代的数学，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它的影响远及国外，在欧洲中世纪数学中的某些算法，例如分数和比例，就有可能是由中国先传入印度，再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例如“盈不足”（也可以算是一种一次内插法）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就被称为“中国算法”。

农业领域里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是养蚕业，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传去的。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的美丽丝绸，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地，后来养蚕方法也是由新疆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非洲、欧洲去的。公元 7 世纪，养蚕方法首先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 世纪传到西班牙，11 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 世纪蚕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大利，便效法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英国，西方才有了自己的丝绸业。

医学方面对西方比较有影响的是针灸疗法。公元 513 年，中国医生杨尔去日本讲授医学。公元 701 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中国医书，作为学习医学和针灸的必修课目。宋元以后，随着海路航运事业的发展，我国和非洲、欧洲不断有了相互交往，针灸疗法也逐渐被介绍到这些地区。当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的一些医学家，都开始把针灸应用于临床和研究。同时，也翻译了一些中医针灸著作，成为人类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

中国清代发明的预防天花的“种痘法”，在 1688 年传到俄国，以后又由俄国传到土耳其。18 世纪传入英国，得到英国国王的赞同。不久由英国传到欧洲各国和印度。

在我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中，最早传播到西方的是我国造纸术。8 世纪中叶经中亚传到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纸张大批生产以后，就不断向欧洲各国输出。于是，造纸术也随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18 世纪的 2000 年间，我国的造纸术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世界各国沿用我国传统的方法造纸有 1000 年以上历史。现代机器造纸工业的各个主要技术环节，都能从我国古代造纸术中找到最初的发展形式。16 世纪纸张已经流行于全欧洲，终于彻底取代了传统的羊皮纸和埃及莎

草等。此后，纸张便逐步流传到全世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早在唐代，我国和波斯、印度、阿拉伯等一些国家，有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就在这时，硝磺同医药和炼丹术由我国传出。但是，直到公元 1225 ~ 1848 年间，火药才由商人经印传入阿拉伯国家。欧洲人，首先是西班牙人，在 13 世纪后期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主要的火药武器，大多是通过战争西传的。据史书记载，元代初期，阿拉伯人西征中亚、波斯等地，在交战中，才知悉包括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在内的火药武器，进而掌握了火药的制造和使用。欧洲人又是在和阿拉伯的战争中，接触和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火药、火器传到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作为工业的、经济上的进步力量，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国家。从 12 世纪以后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导致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

我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印刷术，都是在我国印刷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约 12 世纪，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传到埃及。13 世纪，欧洲人来中国多取道于波斯（今天的伊朗），波斯当时已经熟悉了中国的印刷术，并且曾经用来印造纸币。波斯实际成了当时中国印刷术的中转站。14 世纪末，欧洲才出现了木版雕印的纸牌、圣经和学生用的拉丁文课本。而活字印刷术是元代时由我国的新疆传到波斯、埃及，再传到欧洲。公元 1450 年前用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用铅、锡、锑的合金初步制成了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

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 1863 年给恩格斯的信里把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我国古代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对西方和世界科技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节 近代西方科技对中国的冲击及反应

中国是以四大发明著称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却落伍了。当西方科技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同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东方的巨狮愚昧自负地试图仍旧保持它那帝王之尊”。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产阶级凭藉其强大的科学、经济、军事实力，用重炮轰开了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大门，

告诉了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落伍了——落伍是要挨打的。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以长矛大刀弓箭为基本兵器的清朝军队不堪一击，落后的农业与西方机器工业相去天壤；脆弱的民族工商业抵挡不住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逼人气势——这是西方近代发达的科学技术以经济、军事力量的形式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不仅如此，西方科学技术还通过传教士等途径传入中国，给近代中国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早期是在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目的，以科学技术为诱饵，以图在中国立足。传入的科学技术知识早期主要是天文、数学、地学、物理、兵器等，后来则涉及化学、进化论、医学、各种工程、工业技术等。代表性的人物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他们一度与当朝要员过从甚密，甚至得到封建皇帝的赏识。

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态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盲目排斥的态度。皇帝、大臣们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妄自尊大，视西方科学为“奇技淫巧”，推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杨光先主张“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洋人”。“洋务运动”时期以醇亲王奕环、大学士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代表的“顽固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这些话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取向，具有代表性，发人深思。当时朝野中确有一些人视西方科技为“邪术”，反对“西学”，甚至“一闻造铁路、电报则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杨光行等人看到来华西人并非为了帮助中国人掌握西方技艺，而是别有所图，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们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重礼教，轻技艺，认为靠中国之学术、纲常名教足以经世兴邦，这是十分守旧、腐朽的错误思想。清政府在 1723 年至 1840 年间，几乎中止了接受西方科技知识的政策。他们闭关自守，对我国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态度上，比较开明的帝王、朝臣，进步的知识分子持接而纳之的态度。

清朝顺治、康熙二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很感兴趣。顺治帝对德国人、传教士汤若望很器重，命他掌管钦天监。康熙帝从西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孜孜不倦，比利时人、传教士南怀仁就曾给康熙讲课。南怀仁任钦天监监正，奉命监造观象仪器多种，“吴乱”时奉谕督制西洋大炮，大受嘉奖。康熙亲自领导完成中国全图测绘，在他的支持下，1690 至 1721 年编成《数理精蕴》这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他亲政期间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最为活跃。

19 世纪 60 年代，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出发，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先是

建立近代新式军事工业，在意识到“必先富而后强”的情况下，又兴办了一些民用性企业。除罗致一批科技人才外，还兴办新式学馆学堂，派人出洋留学，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我所用，早期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就以忧国之情怀、爱国之热情，痛感当朝之腐败，中国之落后，力求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更法”、“变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发展科学技术，开办近代工业商贸，康有为、严复等人看到“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又“加以电邮、气舟、铁辙三者”。中国欲开民智，求富强，必须“用西洋之术”，“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近代一批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不仅自己占有大量科学技术知识，而且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严复等。

以上这些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技术的帝王朝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或出于维护封建经济的需要；或盲目照搬西方，主张“全盘西比”；或囿于“中体西用”；表现出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他们向西方学习，救国图强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客观上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改革，人才的培养，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20世纪中叶，是科学大变革的时代，人类在天体演化、生命起源，基本粒子三大科学前沿下不懈地探索，以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宇航四项突破为代表，以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天和海洋技术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对我国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发挥制度优势，重视科技开发和人才培养。在基本粒子研究、生物工程研究、地质探矿研究、电子计算机研究、原子能利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与我们底子薄、基础差、人口多和实践中的失误有关。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民族，必须迎接挑战，抓住机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人才和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正视困难，承认差距，不甘落后，奋力追赶。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有值得骄傲的过去，也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四章教育

第一节中国古代教育

教育起源于人类传授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中华民族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中国古代教育始于原始社会，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其教育必然是一种无阶级差别的共同的社会活动，人人都受教育。而且，教育的内容、方式等是受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制约的。在原始社会，教育还没有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它主要是通过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及宗教仪式活动来进行的；教育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语言、口耳授受及实际行动的模仿；其内容主要是学习制造石器和木制工具，火的使用以及采集、渔猎方面的技能。后来又增加了农业的制陶业、符号图形文字、音乐、宗教仪式的学习。

总之，原始社会的教育是非常落后和原始的，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和专职的教学人员。

在中国最早出现学校的朝代是公元前 2100 年始的夏朝。孟子曰：“夏曰校”，“校者，教也”。夏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在奴隶社会，教育具有了阶级性。只有奴隶主和极少数自由民才有资格入学。教育的内容是射、御、礼、乐、书、数，是服务于奴隶主统治阶级的，但夏商西周三代各有偏重。如：夏朝教育以射御为主，“以射造士”；商代则以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以乐造士”；到了西周则以礼为先，提倡“尊礼重施”，“以礼造士”。

随着正式学校的出现，也同时产生了正式的教育行政官吏，名曰“司徒”。学校全是官办，在夏商西周三代没有出现“私学”。

中国奴隶社会的教育思想，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是强调君权神授、王道至上，以及以孝、友为中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这也为以后封建礼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史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完成的一个时期。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其统治地位，各诸侯国为了兼并土地、争夺霸权，进行了频繁战争。“春秋之中，弑君 36，亡国 52”。最后终于形成了齐、韩、赵、魏、秦、楚、燕七国争雄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形势，使得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官学趋于解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邓析、少正卯等）兴办的私学逐步兴起，并且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潮流。学术文化空前

《孟子·滕文公上》。

《史记·太史公序》。

《左传·昭公十年》。

发展，出现了各种派别不同的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反映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的要求，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流行的学派，分为阴阳、儒、道、墨、名、法六家，加上纵横家、杂家、农家合称为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则称为十家。他们办私学，招学生，传授本派的观点和学说，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大家，又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对后世影响最大。

官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所发展，但不如私学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大。“养士”制度可以说是各诸侯国官学的一种变形。“士”就是知识分子，“养士”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拥护，以巩固和发展各自的势力，但它对古代教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弟子多达 3000 人，精通六艺者 72 人。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主要有两大贡献：首先，他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其次，开创私学，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论语》一书是我们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所依据的主要资料。

关于教育的作用，孔子认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不一定直接去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孔子认为人的成长中教育起着决定作用。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关于教育的对象，孔子明确地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打破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不论贫富、贵贱以及“国别”，人人都可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关于教育的目的，孔子从“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出发，一方面提倡“礼贤下士”、“举贤才”，要求吸收和重用社会上已有的贤能之士；另一方面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君子贤人。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关于教育的内容，孔子主张以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教育服从于道德教育的需要。《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学而》篇更明确地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特别重视诗、礼、乐的教育。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

《论语·阳货》。

《论语·卫灵公》。

《论语·子张》。

《论语·泰伯》。

立。”《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孔子都向学生传授。尤其可贵的是，孔子在教育内容中排除了天命鬼神等迷信色彩的内容：“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当然，孔子的教育内容也具有严重的缺陷，一是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二是鄙视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立志乐道。就是要确立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解决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第二，自省自克。要善于自我省察，自我克制，一方面，“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另一方面，“克己复礼”，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第三，身体力行。也可以说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道德修养要成于内而形于外，道德水平的高低要通过行动来检验。第四，改过迁善。孔子认为完美无缺的人是罕见的，克服缺点与发扬优点往往是相辅相成的。这里的关键是对待缺点、错误的态度。有的人文过饰非；有的人，有了缺点不怕别人知道，决心改正，不再重犯。

孔子关于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可以概括为如下四项主要原则：第一，因材施教，第二，启发诱导，第三，学思结合，第四，博约兼顾。

孔子以自己40余年的教师生涯和亲身体会，提出许多关于教师修养的意见，值得后世教师借鉴。第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第二，热爱学生，对学生无私无隐；第三，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孔子特别强调教育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学生的表率。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墨子也是私人讲学的大师，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孔子的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墨子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所提出的许多见解却是相当深刻和精辟的，同样丰富了古代教育思想。

墨子很重视教育，希望用“上说下教”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把“有道者劝以教人”作为三大治国的措施之一，极力反对“隐慝良道不相教诲”，认为“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关于教育目的，墨子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贤士”，主要标准是“兼爱”，所以有时称作“兼士”，就是“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不仅要“厚乎德行”，还要“辩乎言谈，博于道术”，肯于牺牲自己以成人之急。为了培养“贤士”，在教育内容上，除了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外，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

《论语·季氏》。

《论语·述而》。

《论语·先进》。

《论语·卫灵公》。

《论语·子路》。

《墨子·尚贤》。

军事知识和技能、论辩才能的研究和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曾经注意到教育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墨子的教育、教学原则有几点特别值得重视。第一，“强说人”的主动精神。他不同意儒家等人求教，“来者不拒”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主动“强说人”。第二，“述而又作”的创造精神。他说：“吾以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以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第三，“察类明故”，发展理论逻辑思维。他很注重培养学生的论辩才能，发展学生的理论逻辑思维。在博与约的关系上他强调以约驭博，与孔子的“由博返约”略有出入。第四，“强力而行”的刻苦磨炼精神。

孟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战国中期继孔子之后的著名教育家和儒家大师。他热爱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看作是人生的三大乐趣之一。孟子从“施仁政”的政治主张和“性善论”的哲学思想，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一方面，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是“得民心”，“得民心”是“仁政”的关键，而教育是“得民心”的最有效措施。他认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求放心”，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肯于学习都可以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能够“明人伦”的君子或统治人才。他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孟子说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以“明人伦”为中心的教育目的，决定了教育内容是以孝悌为主体的道德教育。他认为仁义礼智的基础就是孝悌，所以他主张教育的全部内容就是“申之以孝悌之意”。

孟子在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第一，“持志养气”。孟子十分重视立志，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注意“尚志”“持志”。与持志紧密相联的是“养气”，我们常说要有“志气”，就是由此而来。“养气”的含义，解释很多，孟子本人讲的养气是“吾善养”

《墨子·耕柱》。

《孟子·尽心上》。

《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子下》。

《孟子·滕公文上》。

《孟子·离娄上》。

《孟子·惠梁王上》。

吾浩然之气” ,第二 ,反求诸己。他认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是“ 反求诸己 ”。这是孟子也是儒家一贯重视的修养方法。其主要含义有二：一是行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应从自己检查,“ 爱人 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 反求诸己。” 二是要厚人责己, 不要怨恨胜过自己的人,“ 仁者如射, 射者正己而后发, 发而不中, 不怨胜己者, 反求诸己而后已矣。” 第三, 改过迁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强调要培养改过迁善的精神, 一方面鼓励了人们改过自新, 一方面积极学习别人的善行。他特别赞扬“ 闻过则喜”, “ 见善则迁”, 提倡“ 与人为善”。第四, 刻苦锻炼。孟子认为人的道德和才智都是在艰苦中锻炼出来的。他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他提出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著名思想, 并认为大丈夫应能做到在各种考验面前毫不动摇, “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甚至在生死面前要“ 舍生取义”。

孟子在教学方面提出的主要原则和方法有自求自得、专心有恒、启发引导、循序渐进诸方面。

《学记》, 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末期孔孟学派的著作, 可以看作是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 是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成书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教育学专著。《学记》中两段文字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教育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发虑宪, 求善良, 足以谏闻, 不足以动众; 就贤体远, 足以动众, 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 “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成为后世论述教育作用问题的经典表达方式。《学记》以托古的方式拟定一个从地方到中央的理想学制系统。“ 古之教育, 家有塾, 党有庠, 术(遂)有序, 国有学”。又以大学为例, 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察标准。《学记》还记录了古代学校管理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制度和规定。如开学、入学、视学等仪式。《学记》在综合各家长期教育、教学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总结了一套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一) 教学相长; (二) 尊师重道; (三) 藏息相辅, 认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 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学习与休息兼顾; (四) 豫、时、孙、摩。《学记》总结了长期教育、教学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概括出“ 教之所由兴” 和“ 教之所由废” 的重要规律。豫, 就是顶防, 在不良行为和习惯发生、形成之前,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离娄上》。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告子下》。

《孟子·告子下》。

《孟子·滕文公下》。

教育措施就走在前头，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叫做禁于未发。时，就是及时，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施教。孙，就是顺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循序渐进。摩，就是相互观摩，同学之间取长补短，切磋琢磨；（五）启发诱导；（六）长善救失。《学记》还提出了许多教学方法，诸如“问答”、“讲解”、“练习”、“类比”等。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对于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但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依靠法家，“颁挟书令”、“禁游宦”和“禁私学，以吏为师”，焚书坑儒，这都箝制了秦朝文化思想的发展，使得官学和私学都几乎被废止，并且使许多古代文化书籍从此失传，严重地影响秦朝文化教育的发展。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受到秦末农民战争的影响，采取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君权神授”及“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最重要的武器。

汉代又开始兴办官学，私学也迅速发展，汉代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教学非常重师承。考试成为汉代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并是学生走上仕途的一条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尚清谈。以“九品中正制”作为取士之标准，严重地影响了官学及私学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学校制度的某些方面比汉朝有所进步。例如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四门学的创立，以及专科学校的开设等等，都对于隋唐的学校制度有直接的影响。至于取士制度，在考试方式上前进了一步，为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

到隋唐时期，士族已失去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庶族地主的势力已发展到要求参与政权的地位。因此，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自然就不适用了，而代之以科举制度。唐代教育的重要特点，首先是设立了科学技术专门学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首屈一指。其次，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至唐代益加完备。

自隋唐至清末，科举制度维持了1300年之久，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科举制度最适合于封建统治者的要求，成为有力的统治工具之一。

科举考试的内容，尽管各朝不尽相同但主要是儒家经典。这样，就把人民的思想牢牢束缚在封建礼教之中，使人民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顺民。

各朝各代提倡科举，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中小地主开辟一条参加政权统治的道路，缓和阶级矛盾。二是，为了加强对社会思想的控制，不断发展壮大的私学和官学，一直是某种社会新思潮的必源地。统治阶级也总是想控制它们。因而，便利用科举制度，使考试的内容成为教学的内容，使取士的标准无形中成为教育的培养目标，以此来控制全国的教育。从而，把私学纳入国家的需要，为统治者服务。

对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要作具体的分析。

科举制度在其实行之初，表现出以下的积极意义：(1) 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里收归朝廷，有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2) 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使官僚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3) 根据考试的成绩选拔人才，能调动地主阶级，尤其是小地主阶层子弟的学习积极性；(4) 从下层吸收人才参加各级统治机构，不仅改变了封建政府中官吏或分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的活力，提高经济效能，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笼络下层知识分子，牢笼天下英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也选拔了一些有才识之士。历代以科举入仕而显名后世的，唐代有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宋代有寇准、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明代有于谦、海瑞、张居正、史可法等；清代有林则徐等。

然而，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科举制度本身的缺点和弊端，有以下几点：第一，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章句和华丽的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轻视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第二，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权势的最好门路。因此，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富贵荣华，锦衣玉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严重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第三，科举考试的最后取舍是由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决定的，录取标准又多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有初录取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请托、重门第、通关节、贿赂、科场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等名利贪贿之风就公开泛滥起来，严重地毒害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败坏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宋元明三代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官学制度，并且都以程朱理学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学校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这一时期最有特色的还是书院的设置、繁荣。书院的建置，始于五代而初盛于宋。在初期多是私人办的，后来逐渐由中央令地方设立即官办。书院是北宋到清代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它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地位。书院虽不反对科举，却不重视科举；在政治上则多少是代表“清议”，批评朝政，事实上成为地主阶级内部反对派的基地。

清朝建立至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实行用儒术统制思想和政策，仍然采用科举制度以笼络欺骗知识分子，利用理学和八股文以麻醉思想。另外，还采取许多压制思想的措施，如大兴文字狱等。学校建置承袭明代旧制，在京设国子监，在地方设州府县学，大设书院。而私学也更加兴盛，出现了一批

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教育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兴办私学，著书立说，宣传民主思想及唯物主义，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第二节西学冲击下的近代教育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更为复杂，也使近代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由一个单独的封建教育体系，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

中国社会的近代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教育发展，可以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前一个时期，即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义和团运动（1900年）的中国近代教育，有下列情况和特点：在这一时期，外国侵略势力为了配合其政治、经济的侵略，也积极推行其文化侵略活动，以加深中国文化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为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在中国各地大办教堂、医院、学校、报馆等来奴化中国人民，他们还勾结洋务派，企图直接控制中国近代教育向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使中国文化趋向于殖民地化。

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一部分地主阶级先进思想家，提出了学习西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改革教育制度的要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良主义的先驱。

1860年以后，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化。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洋务派，要求办“洋务”兴“西学”，开创了洋务教育事业。一方面，沿袭封建教育的“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开设天文、化学、物理、医学等课及外国军事学习、语言学习等课程，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并试图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洋务教育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一个开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改良思想的继续。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不良、学术的落后，所以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提倡“西学”入手。他们组织学会（如：强学会、保国会等），兴办学校（如：万木草堂、时务学堂），设立报馆（如：《时务报》、《国闻报》），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

除了清政府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外，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也对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太平天国便

对封建礼教加以批判，把儒家经书作为妖书予以焚毁，给妇女和儿童受教育的权利，采取歌谣、揭帖、诏书等形式进行广泛的群众性教育，改革了文字和科举制度。这都对当时的教育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5年8月（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儒学教育深受打击。这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新教育制度正式确立了。同年，还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作为统辖全国的正式教育行政机关。

清朝新的教育系统完备的学制是光绪29年（即癸卯年）所颁布的“癸卯学制”，它对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的教育制度，主要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当时的留学教育和华侨教育也逐步得到发展。

新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确是比旧的教育制度前进了一大步，它是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形式的一种制度，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特点是日本教育的一个产物。它虽然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学习目标，采用了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但是，在骨子里它还是被封建旧教育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所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提倡公民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和美感教育，废除学校里的“读经”科目，注重中、小学的兵式体操、唱歌和美术的教学。但是，民国成立不久，封建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军阀代表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一切革命计划、包括教育在内都被破坏了，封建的文化教育又迅速地恢复起来。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的奴化教育和反击“复古尊孔”的复辟逆流，资产阶级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从1915年起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在全国掀起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重视对青年人的教育，促进了社会教育的进步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从此深入人心。但这些并没有使中国的教育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这就不得不使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及其新的阶级力量去完成中国革命，包括教育在内的事业。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厂巨大的变化，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大力推行“党化教育”，提倡封建的“四维八德”，要学生“明礼仪，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企图以此禁锢学生的头脑，使学生忠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此，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教育，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

同国民党完全相反，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教育。在工人中间创办夜校，在农民中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扫盲教育，提高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在解放区根据地，设立干部学校和士兵学校，破除迷信，用无产阶级思想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文化、军事技术学习，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第三节教育与中华民族的振兴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立即着手对旧教育制度进行改造。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并且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学制。

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吸收了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彻底清除了教育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充分地保障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工农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教育为工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同时，又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要“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总结出“三个结合”、“六个并举”的教育原则。尽管当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新中国成立后10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

在以后的教育政策中虽然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随着1976年以后国家政治、经济的好转及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解放前教育发展的最高年度（1946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368.3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为149.6万人，受教育的人数只占人口的5%左右。而现在，截止到1990年底的统计，全国各级普通学校总计1045275所，在校学生19675.58万人。其中小学在校学生12241.38万人；普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5239.19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为206.27万人；研究生在校生为9.31万人。另有成人学校317956所，在校学生3978.17万人。40年前，我国人口中80%为文盲，现在已下降到15.88%。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8%。少数民族教育也有很大的进步。

建国40年，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除了底子薄、基础差外，教育和科技落后也是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来源及发展都必须依靠教育。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高精密尖端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新知识和传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教育，便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大法宝。教育资金不断追加，教育手段、教育制度也不断更新，可以说，教育是21世纪各国经济竞争的重要

手段。

我国 1983 年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口号，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教育工作的要求及社会主义教育应具有的时代特点，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战略目标。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义务教育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人才，提高现有人才的水平，而且必须提高全党全民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准备新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新闻出版工作者。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就向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人才，包括有一定的政治、技术和文化准备的劳动者，主要依靠教育来培养。重视知识和人才，就必然重视教育。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教育投资是开发智力资源的投资，教育投资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日本、新加坡自然资源都很缺乏，经济发展却很快，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抓住教育不放。在旧中国，一些仁人志士也认识到教育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性，提出过“教育救国”的口号。这个口号连同“科学救国”的口号，既有其本身的局限性，而且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今天，我们认识到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并具备了发展教育，振兴中华民族的社会条件。但是轻视教育的思想仍然很严重。这同我国封建思想、小生产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以及“左”的思想影响有重大关系。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对办教育很不重视，甚至占有办学场地，调走教师，连教育经费也挪作他用。另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读书无用”及青少年学生的辍学现象，也严重地影响了大、

中、小学的教学质量。

因此，要发展教育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扩大教育资金的来源；第二，以法办教；第三，进行彻底的扫盲运动，提高全民素质；第四，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五，提高认识。

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繁荣富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有助于中华民族以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章 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以擅长哲学思维著称于世。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早期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的滥觞，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这个时代孕育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哲人，诸如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等。他们纷纷树帜立说，号称“百家争鸣”。这一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显著变动的时期。公田改私田，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者的兴起，诸侯的纷争，“家天下”的离析，“国人”的暴乱表明当时的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作为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当时经济、政治权力下移并分化，使思想家们能够以不同的地位、立场、观点出发来认识世界，建立自己的学说并互相发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已有相当发展，语言文字已相当成熟。在天文、地理、医学、金属加工、建筑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此外，还有神话传说、巫术图腾、典章礼仪、诗歌音乐等等。孔子时已有所谓“六经”、“六艺”。从而为先秦诸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使这些文明古国的“骄子”能够把目光投向那玄妙的形而上领域，在龙文化的舞台上演出了辉煌灿烂的一幕。

春秋战国时期，能把相当时间用于脑力劳动的阶层的存在，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目的需要，对有文才武略的人们的器重，纷纷效法周公，礼贤下士，对哲学思想的活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哲学流派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他们在宇宙发生说，辩证法，认识论，伦理道德，历史观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一、老子的宇宙发生说

“道”，是老子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准则、宇宙的本原等。在《老子》5000言中，“道”一共出现了74次。

老子建立了“道生一，一考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的宇宙发生说，并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著名命题。“有生于无”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和引申的，于是关于老子就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甚至在现代哲学史著作中，同一本书就有前后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认为，老子的宇宙发生说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老子》书中关于“道”、“无”有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同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不难看出，老子所说的“道”，在这里是指化生万物的原初物质。虽然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是恍恍惚惚、混混沌沌、窈窈冥冥、冯冯翼翼的，但它却是有“物”、有“象”、有“精”、有“信”的。显然，老子把道说成是无的时候，这个无是感性直观上的无、无形之无。但是道无形无状却有象，它无实形可见，但可由想象得之。它不是纯粹的虚无。就像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在风箱中可以体验到它的存在。正是这种“虚而实”、“无而有”的道，先于天地而存在，并遵循自然法则化生出宇宙万物。所以，老子说：“道者万物之奥”、“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²以热大爆炸宇宙模型为代表的现代宇宙论，不仅可以给出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命题以自然科学例证，而且表明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是一个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眼光来加以研究的描述的问题：

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指出：“道”和“气”的概念包含着现代物理学中“场”的观念。“道”作为虚空和混沌可以产生一切形式，“气”就像量子场，它不只是物质的基本要素，而且还以波的形式传递相互作用。



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不能不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它的积极的方面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老子强调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必须顺从天道，不能“妄作”；老子强调“道法自然”，与上帝创世

¹《老子》第42，40章。

²《老子》第14，21章。

有生于无之“有”，是感性直观之有。

说、神学目的论形成鲜明对照；老子把丰富的辩证思想引入他的宇宙生成模式并作为人生方法论，意义是重大的。特别是“道”、“无”概念的使用，克服了有形之物为世界本原的局限性，标志哲学理性思维已达到一定高度。老子大概已经看到了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有形的具体实物遇到的实际困难，故尔高明地把道理解为超感性直观的，不能用解释有形之物的方法去规定它。即如黑格尔所说：“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

《老子》一书，是先哲奉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哲学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吸收、借鉴、阐发了老子的思想，尤以道家和道教更为敬奉。《老子》一书在海外也流传很广，目前得到一些自然科学家和政界人士的注意，给以很高的评价。

二、老子、孙子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思维，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中居重要地位。老子、孙武不仅开中国哲学辩证思维之先河，并且以其涉及面广、具有实用性而为人们称道。

运动变化的思想

老子看到了事物运动的普遍性：万物都在生长发展、变化纷坛（“万物并作”、“万物作焉”），并指出：“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孙子也看到了天地无穷，江河不竭，日月往复，四时更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从事物的联系出发全面看问题的思想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生活诸方面有复杂的联系。因而，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孙子列举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和老子都有关于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论述，并在两点论中隐约地包含有重点论的思想。孙子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尽人皆知的名句。

矛盾对立与统一的思想

老子指出，一些看似对立的東西，实际上是互相依存的。所谓“有无相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页。

《周易》中亦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第6章

《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兵法·虚实篇》。

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对立面不仅互相依存，而且互相斗争。这种斗争，概而论之就是阴阳、刚柔、强弱之间的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导致了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对立面的转化，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所谓“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孙子也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

必然性和规律的思想

在老子思想中，道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指世界的本原、化生万物的原初物质；二是指法则、规律，作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具有普遍的意义，统摄天地万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量变引起质变的思想

老子注意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强调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因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孙子在承认客观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制约作用的同时，还意识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孙子和老子的辩证法思想都不是纯思辨的玄思，而是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有很强的实用性。他们把这一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来解决社会生活实践问题。比如，老子指出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在老子书中，类似的言论是非常多的。

三、孔子、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先秦时期，伦理道德思想就已理论化系统化了。这一工作是由多人（先秦诸子）完成的，尤以儒家的贡献为最。古希腊哲人也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但是前苏格拉底时期主要兴趣在自然观方面，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主要研究至善、幸福、快乐等问题，智慧、勇敢、节制、公正为四主德。哲学家比较注重个人的道德体验，常常以个人为出发点和目的。通过道德修养来塑造具有美好德性的人格，臻于至善。从而摆脱烦恼和痛苦，获得快乐和幸福。中国先秦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则具有强烈的宗法色彩，为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仁、义、

《老子》第2，40，58章。

《孙子兵法·势篇》、《孙子兵法·九地篇》。

《老子》第25，16章。

《老子》第63，94章。

《老子》第22，36，81章。

礼、智、忠、恕、孝、悌、信、勇、美、善、觉、诚、志、气、命、性等范畴。注重整体利益，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或以己属人、或推己及人、或舍己为人。其要义在血缘宗族关系方面，有利于家庭、宗族、社会的和谐与团结，维系既定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孔子及其后学孟子等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是以德治国的“德治论”。

在儒家创始人、先秦著名思想家孔子的《论语》一书中，作为道德标准使用的“仁”字就有100余次。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仁”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仁是自我修养的根本原则，在智、仁、勇三德中，仁是核心。智是知仁，勇是行仁，所谓“力行近乎仁”，“仁者必有勇”。行仁必须做到“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内在修养的功夫就是从仁出发，行仁，达到仁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人生所追求的崇高的道德境界。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其次，仁是规范血缘关系的重要原则。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血缘宗法制度下，讲究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尊祖敬宗收族事君，所以孝悌成了仁的基础。再次，仁是具有广泛意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谓：“仁者爱人”、“忠恕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强调自己而是推己及人。最后，仁为重要的施政方针。作为被统治者，要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自觉地按照宗法礼制规范行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统治者、执政者，要以慈善宽惠之心待人，要“泛爱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做到这些，就可以“近者悦，远者来”，就可以“天下归仁”。

孔子也曾强调“宽猛相济”，但从整体上是强调以德治国。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就像水无有不下一样。他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论语·宪问》、《论语·里仁》。

《论语·卫灵公》。

《论语·学而》。

《论语·颜渊》、《论语·雍也》、《论语·卫灵公》。

《论语·颜渊》、《论语·阳货》、《论语·子路》。

《论语·为政》。

《孟子·公孙丑上》。

仁义礼智四德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人心固有的。但庶民因蔽于物欲而失之，“陷溺其心”。因而有必要养心寡欲，修养善性。他提出通过内省或借助“清明之气”发现“良心”，并以“存夜气”的方式加以保持。同时，他认为还必须进行教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所谓：“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

由性善论出发，孟子阐述了他的“仁政”学说。他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施政者而言，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与孔子“庶富教”的思想相一致，孟子也主张先富后教。他认为“仁政必自经界始”，划正地界，使民有恒产，有恒产而后有恒心，安居乐业，不做坏事，天下就平定了。孟子进一步指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关于自我修养，孟子提出著名的“养气”说，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标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

先秦政治思想除儒家“德治论”外还有法家的“法治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论。道家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因而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使民无知无欲无争，回到婴儿那样的本真状态。

四、荀子和墨家的认识论思想

先秦诸子哲学都论及了认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范畴和命题，诸如形神、名实、知行关系等，提出了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其中，荀子的思想具有总结意义，墨家则因注重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而著称。在形神关系上，荀子持“形具而神生”的观点；在人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上他持可知论的观点（“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坚持反映论立场并划分了认识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缘“天官之当薄其类”即通过感官获得感性认识，第二阶段是“心有征知”好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荀子在总结前人有关天人问题的零星见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天道自然、天行有常、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既肯定了客观规律又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认识方法上，荀子认为人因“蔽”于某些方面而导致认识上的片

《孟子·尽心上》。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尽心下》。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梁惠王上》。

面性，而“知道”（把握客观规律性）可以“解蔽”，“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即虚心、专心、静心。在《正名》中，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认为约定俗成的名是由实派生的，并论证了“共名”和“别名”的辩证关系。在知行关系上，他强调“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墨子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经验论立场，强调“众之耳目之实”是认识的唯一来源，“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见莫闻，则必以为无”。在名实关系上，墨子提出“取实予名”、“察类明故”的命题，强调根据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以相应的名称，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察类明故”中的“类”指类别、类比、类推，“故”指原因、根据、理由。墨子把“辩”建立在“察类明故”的基础上，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关于判断是非、检验真伪的标准，墨子提出有名的“三表”法，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从而把事、实、利结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排除主观臆断，否定先验论，但具有狭隘经验论的局限。

后期墨家承认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人通过感官来认识它们（“以五路（五官）知”）。但后期墨家认为只凭感官“接物”是有局限的，还必须有“心”（头脑）的察辨作用。并且，他们把人们的知识分为三类：“闻知”（由传授得来的间接知识）、“说知”（察辨、推理）、“亲知”（直接经验）。他们提出名、实、合、为四个概念、强调“名（名词）实（事物）耦（合）”才能成为真知，而且必须为（志行），这是认识的目的地和检验手段。后期墨家还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等重要的逻辑命题。

五、五行、阴阳八卦说

五行、阴阳、八卦是具有鲜民族特色的范畴、思想。

关于五行的思想，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尚书·洪范》载“鲧殛洪水，汨陈其五行”，又《尚书·甘誓》载：有扈氏“威侮五行”。箕子把五行作为洪范九畴的第一条给以阐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这是先民在治水平土的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的现象、性质及人和自然关系的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的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夏统治者为了巩固并占有治水平土的成果，把“五行”列为根

《儒效》。

《尚书·洪范》。

本大法，专门设立管理水、火、木、金、土等五个部门的“职官五正”。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观点，把这五种物质视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以说明物质世界的起源及多样性的统一，探求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春秋时产生五行相胜的思想，晋史墨以“水胜火”预断战争的胜负，《孙子·虚实》篇云：“五行无常胜”，认为五行之间是相克的。战国时“五行说”颇为流行，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点，说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其合理因素对古代天文、历数、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常被一些思想家，及迷信活动神秘化。阴阳五行家被视为“六家”或“九流”之一。其中有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季节变化和农作物生长的规律，以春夏秋冬四时配东西南北四方，认为四季的变化由五行的盛衰决定，其代表文献有《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邹衍是把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系统化的思想家，但他把此说推广到政治上，提出“五德终始”的思想，把朝代更替视为五行相胜的结果。阴阳家把自然、天象与社会、人事牵强附会在一起，谈论吉凶祸福，是错误的。

阴阳也是很早出现的一对重要范畴，其最初的意义是日光的向背。古代人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看到了客观世界广泛存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势力（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水火、男女、兴衰、治乱、胜负、尊卑）并用阴阳表示之。在《易经》中“——”和“--”（九六，后称奇偶、阴阳）是八卦的基础。乾坤、泰否、损益等范畴为阴阳范畴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先行资料。西周末年，人们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周宣王卿士虢文公认为，土地解冻是由于阴气上升，春雷震动是由于阴阳二气处于“分布”状态。伯阳父以阴阳说来解释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越国大夫范蠡认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老子在其宇宙发生说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易传》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著名命题，把阴阳放在了很高的地位。《易传》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事物内部两种相反的势力“相推”、“相摩”的结果。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组合成八卦：

☰ ☷ ☳ ☱ ☵ ☲ ☴ ☶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其中“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艮为山，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

《左传·定公四年》。

《国语·郑语》。

《国语·周语》。

《易·系辞传》。

《易·说卦传》。

由八卦两两组合又演为 64 卦。八卦的形成建立在人们对客观事物长期观察和把握的基础上。古人用来占筮吉凶，本是宗教迷信，但它象征八种自然现象，又组成四对矛盾（天地、水火、山泽、雷风），以天地为父母，其余为“六子”说明世界的生成，并贯穿了阴阳相摩互易的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倾向，影响深远。

第二节中国哲学的延续与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只能以“经院哲学”的形式在宗教唯心主义的桎梏中苟存。而中国哲学经历了先秦时期的繁荣以后，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保持了重要的社会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既表现为气一无论思想的延绵不绝，在王夫之那里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又表现为玄学在理性思维方面达到一定高度，理学不仅集儒学发展之大成，而且兼蓄了佛、道思想。

一、经学——玄学——佛学

中国哲学在达于宋明理学之前，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三个前后相继又互相独立的发展阶段。它们是中国哲学发展中各具特色的三个环节。

（一）两汉经学

经学之经，引之于织物之经纬。古代典籍多是以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经以“编丝缀属”之义而通称一切典籍，如墨经、法经等。汉代独尊儒术，奉儒家典籍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成了儒家典籍的特称、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之正统。《释名·释典艺》云：“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历代训解、阐发儒家典籍之学，被称之为经学。其起源，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子夏和荀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材的标准，经学大盛。五经者，《易》、《诗》、《书》、《礼》、《春秋》也。加《乐》为六经，但《乐》有声无书（另说亡佚）。汉代倡“孝治”，宣传宗法思想、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与五经合称七经。唐代以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有“三礼”（《周》、《仪礼》、《礼记》），是《礼经》一分为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是阐释春秋经的“传”升格为“经”。连同《易》、《书》、《诗》为九经。唐文宗时把《孝经》、《论语》、《尔雅》列入，宋代又将《孟子》列入，称为十三经。

西汉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解释《春秋公羊传》，开创了今文经学。其经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旧本，由战国以来师徒父子相传，为汉时之官学。今文经学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寄托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六经是治国之法典，所以今文经师为经书作章句，服从当时政治统治的

需要而着重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尤其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东汉何休是今文经学集大成者，所撰《春秋公羊解诂》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西汉中叶以后，今文经学一度衰微，清代中叶再次兴盛。

西汉末经学另一派别为古文经学，其经典为秦时藏匿或散佚于民间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儒家典籍。古文经学对经书字句、篇章中心含意及古代典章制度和人物训解、评论和今文经学不同。他们崇奉周公，以记载古代礼仪的《周礼》为学说的核心，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故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重经籍所记事实，倡文字学和考古学，但其学风往往失于繁琐。古文经学始于刘歆，东汉时贾逵、马融、服虔皆为大师，弟子众多。许慎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文字学研究之必读书。马融的弟子郑玄不囿于门户，遍注古今文经，网罗众家，为汉朝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但失之于常用讖纬的符瑞灾异附会经说。

（二）魏晋玄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儒家受到沉重打击，经学衰落，繁琐的注释，粗陋的祥瑞灾异之说、天人感应论，支离破碎的章句，“已为世人所厌”、“不周世用”。于是，具有玄妙超逸，简约精致特色的思辨哲学——玄学应运而生。玄学尚老庄之学，注重“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以道释儒，着眼于“有无”问题，探究世界的本体。正始时期，何晏“援老入儒”，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又作《老子注》、《周易注》，表现出重视老子的倾向，以“贵无”为特征。提出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重要范畴和“以无为本”，“得意忘言”等著名命题。王弼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千变万化的有以绝对不变的无为本。把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发生说上升为哲学本论。由此出发，他认为名教非本，天地任自然，自然为本。在方法论上，王弼反对两汉治《易》的象数之学，主张把握义理，领会玄旨。提出“寻言以现象”、“寻象以观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的解《易》方法。嵇康和阮籍的思想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一方面，他们主张万物生于天地、元气；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视“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欣赏庄子遁世逍遥的人生哲学，表现了玄学由重老向庄子发展的倾向。当时反“名教”、任“自然”之极端化的发展，是士族子弟以“任放为达”，清淡放荡，甚至“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

在裴颜“崇有”论，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提出“物各自生”而“独化”的观点，主张“名教”即“自然”。注重庄子的思想，具有神秘主义、诡辩论倾向。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殷

若学各宗，则大都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三）隋唐佛学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汉译大量佛教经典，东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广为流行，隋唐时达到鼎盛期。

佛教基本教义有“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认为世间一切皆苦，一切皆空。只有依据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才能超脱苦海，是一种以消极出世为特征的宗教唯心主义。

佛教传入后，以佛理附会玄学，迎合儒家纲常伦理，讲善行善心，重孝道。并以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弥勒佛等形象满足苦难中的民众的精神需求，使佛教能够在夷夏观念深重的礼仪之大邦立足。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并称三教，三教之间长期争论、互相渗透。佛教理论与由依附汉文译经进而建立起许多相对独立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义，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和民间风俗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佛教哲学作为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

在中国佛教哲学中，东晋的僧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少好老庄，后又受玄学本末体用之辨的影响。把玄学与般若学方法沟通，以体用一如的中心思想论述有与无、动与静、知与无知的关系。在宇宙观上提出“即万物之自虚”的命题，反对人为地划分有无，主张有与无的统一，所谓“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有是假有，假有故空，假有不真，不真则空，谓之“不真空”。在动静问题上，他主张“即动而求静”，单发体用一如，即动即静，动静不异的观点。在知与不知的问题上，他提出“无知，故无所不知”的观点，认为万物自性空，是为“无相”，照到“无相”就与实际相符合成为“无知”，圣心无知，就能无所不知，不知之知谓之一切知。在名实问题上，他认为名实无关，名实皆空。

隋唐时各佛教宗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作了自己的贡献。天台宗宣扬“一念三千”，建立了空、假、中三谛圆融并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并有“无情有性”的佛性学说。唯识宗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的“唯识无境”的理论；把思想认识的转变（转依）看成是由迷而悟，则染而净的修习目的。主张用“依他起相”、“遍计所执相”、“圆成实相”三相以解释宇宙万有的性相。用唯识观的方法，能调察三相，达到转染（识）成净（智）而成佛，宣扬“五种种姓”说，认为“无姓有情”者不能成佛。禅宗认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万法”（宇宙间万有）尽是“自性”（人人具有真常心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自悟”成佛。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不必累生累世的修炼，推行“明心见性”、“一悟即至佛地”（顿

悟)的简易修持方法,流行日广。对李翱、周敦颐、二程、朱熹都有影响,对陆王之学的影响犹大。

华严宗是唐代佛教重要门派,其基本理论是法界缘起论。内容有“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门”等。“法界”是包涵理(事物的本性,本体)和事(万事万物、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相、总称。共有四相: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宗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理的体现,事与事之间也是相即相融的。由此提出了一多、总别、性相、相即相入等一系列概念,其“理为性”、“事为相”的观点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华严宗还把法界归于一心,认为理和心也是一回事,事事都是一心的产物,法藏称理事无碍的关系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佛教哲学的许多术语后来被广泛应用。有的成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如“能所”)。佛教哲学的许多命题和观点对宋以来的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宋明理学

魏晋时期一度出现反儒思潮,隋唐时佛学昌盛。但作为像宋这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而言,最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仍是儒家的纲常伦理。于是,理学应运而生。早在中唐时期韩愈、李翱就竭力排击佛、道,指斥其毁灭纲常而误国,力图全面恢复儒家的权威。韩愈认为仁义道法中,道德是“虚位”,仁义是“定名”,实行仁义为道,内心具备仁义为德。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的性三品说,李翱师承韩愈,排佛尊儒。把最为推崇的《中庸》中的性命学说和佛教的心性思想结合起来,称为复性学说。他们的思想被称之为道学,是理学的先声。

随着尊儒,批判佛、道并融其思想于儒的思潮的发展,北宋中期,以讨论理气、心性问题为中心的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产生了从周敦颐到二程的许多重要理学家,提出和使用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形而上形而下、动静、两一、心性、性情、性命、善恶、理欲、人心道心、中和、体用、诚、敬、知行等理学的基本范畴。他们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道,该学说亦称为道学,后来,理学之称渐盛,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着理学中强调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陆象山、王阳明则是主张“心即理”、“心生万物”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

周敦颐在《易》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宇宙生成发展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他认为人得二五之秀气,

为万物中最灵者，但心、性受感外物而有善恶，主张通过“立诚”、“主静”而达到人的最高准则“人极”（诚）。其哲学体系中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

程颢和弟程颐曾同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建立理本论哲学，以精神性的理为宇宙本体，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心性论上，程颢提出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程颢认为人心与外物不可分，由于“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所以要反躬自求，悟得天理。程颐认为万物一理，这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故尔“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修养的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他还认为先天的“气禀”决定人的智愚。程颢关于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的思想对陆象山、王阳明很有影响。

朱熹是二程四传弟子。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是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在本体论问题上，朱熹以理为本，主张没有天地之时先有理，“理在先，气在后”、理气相依。在发展观上，主张凡事无不相反相成，“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在其关于《周易·系辞传》的解释中论及阴阳、动静关系，认为动静不可截然分开。他还看到了运动的两种状态：变和化。前者为顿变，后者是渐化。并认为二者互相联系。在认识论上，朱熹主张“即物穷理”，格物和致知不可分。在知行关系上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以行为重。在心性理欲问题上，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理。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禀气有清浊，故有圣、贤、愚之别。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天理和人欲对立，须通过修养功夫“遏人欲而存天理”。但他也不盲目反对日常饮食欲望。与“理欲”观相联系的是他的“王霸”观。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道心治天下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三代以后“未免去利欲之私”是霸道衰世。

朱熹的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为统治阶级官方所推崇，视为儒学正宗。

正当朱熹把理奉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时候，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外，“即物”才可“穷理”的观点，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的主张，并就有关问题与朱熹进行辩论，是为与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相区别的心学主观唯心主义。陆九渊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在心物关系上得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的结论。他认为“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显然，陆九渊把主观与客观完

《遗书》卷二。

《象山先生全集·杂说》、《语录上》。

全等同，用主观吞并了客观。

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以陆学传人自任，宣扬心学，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所谓“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据说他曾和消极直观的方法验证“格物”能否“致知”，最后得出结论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格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用反求内心的方法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在知行关系上，他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知行合一说。

三、元气论唯物主义的发展

中国哲学史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宇宙论上的元气论唯物主义，它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史，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元气论唯物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老子的宇宙发生说，管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提出“精气”说，《列子》和《淮南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王充的元气是一个重要环节，王夫之哲学，是元气论唯物主义的高峰和总结。

（一）王充的元气自然论

在汉代，王充因具有明显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无神论倾向和提出系统的元气论宇宙观而著称。

王充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天地，含气之自然”。关于宇宙起源，王充谈到：“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滓濛鸿，气未发之类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他认为人与物一样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基于此，王充对当时流行的天感应、灾异谴告、天降祥瑞、鬼神等给以抨击。认识上重“实知”、“效验”，主张“须任耳目定情实”，并强调“不徒耳目，必开心意”，以“按兆察迹”、“揆端推类”。反对生而知之，肯定文化和历史的进步，赞成“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但认为“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有机械论、命定论倾向。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人禀气有厚薄，固人性有善恶。

（二）嵇康、杨泉的元气论

《谈天》。

《辨崇》。

魏晋时嵇康、杨泉用元气论唯物主义反对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唯心主义。针对万物“以无为本，恃天而生”的思想，嵇康指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杨泉认为天是元气，星是元气之英，“元气皓大，则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犹如薪尽火灭，“无遗魂也”。

（三）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的气一元论

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扬的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活跃着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等，他们反对天有意志赏善罚恶的思想和宗教唯心主义，坚持了元气论宇宙观。

范缜继承了王充天道自然、元气自化的思想，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性，指出“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悦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进行过两次公开大论战，用偶然论的自然论反对因果报应，主张“形神相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其《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

柳宗元继承了以往的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未形时唯有元气，天地既分后元气居于天地之间。所谓“留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上而玄者为天，下而黄者为地，浑然中处者为元气，寒而暑者为阴阳。针对天能赏功而罚祸的思想，他问道：“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痛痔也；阴阳，大草本也；其焉能赏功而罚祸乎？”^①

刘禹锡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无“形”、“空”是“形”之希微者，反对以“空”、“无”为世界本体的观点。并且把前人论及的气、阴阳、五行、天地纳入他的宇宙发生说中，指出：“天之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仪既位，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他还提出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天和人各有其所能，天无意志，“非务胜乎人”；人有意识，故“人诚务胜乎天”。

（四）张载、王安石的元气一元论

张载虽被称为道学创始人的“北宋五子”之一，然其哲学倾向与一般道学唯心主义不同，他批判以空、无为本体的思想，肯定是充塞宇宙的实体，不仅“可状”者为“有”皆气，而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气聚散变化而生万物，永恒不灭。而且，气“一物两体”是包含内在矛盾的统一体，天下无一物无阴阳者，并由此揭示物质运动变化的原因：“天地变化，二端而

①《明胆论》、《太师箴》。

②《物理论》。

③《神灭论》。

④《天论》。

已”。

王安石继承老子哲学思想，提出道气一元的宇宙衍生论。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他认为生物者是气，气生成五行，五行运动变化，构成万物。变化的原因是物“皆备有耦”。

（五）王夫之的气一无论思想

王夫之总结和发展的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他认为气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实体。理作为气变化过程中的必然性，是依存于气的。在道器关系上，主张天下惟器、器在道先，道器不可分，但道是因时而变的。

王夫之坚持“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发展观。认为动静互涵为万变之宗，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一物两本”的思想，认为阴阳、刚柔、寒温，必相反而相仇，而已“互以相成”。

在认识论上，王夫之利用并改造了佛教哲学中的“能所”范畴，强调“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反对“消所入能”。在知行关系上，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知反对“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的观点。

在天人关系上，他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知天之理”就可“善化化物”、“裁天”、“胜天”，甚至“以人造天”。在理欲问题上，他认为“有欲斯有理”。有欲是人之大共，但可以道德调节之，并且认为“天理高于人欲”，“人欲之各得即天之大同”。他还断言人性是变化的，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

王夫之反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由质到文，由分到合不断进步是总的趋势。反对“天命”、“神意”、“道统”主宰历史的观点，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节 西学影响下的近现代哲学

早在明朝中叶，在处于封建制度末期的东方帝国中，就已滋生资本主义萌芽，加之耶稣会士来华，西学传入，在明清之际，出现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颜元、戴震等人。他们抨击程朱陆王之学和封建君主专制，提出民主法制的朦胧理想，力图借鉴西学，结合科学的新发展来进行哲学研究，并表现出重“习行”、倡“实学”、重

功用的倾向。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置身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强烈的改良愿望，对外反对资本主义侵略，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对内要求改革封建弊政，摧毁“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面对高势能的异质性文化，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思想揭开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序幕。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试图会通中西、融贯新旧，在批判封建旧制度旧传统，促进思想解放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阶级力量的软弱，社会变化的急速，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彻底性，难以形成高水平的系统的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起我国科学家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如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后来，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也传入我国。当时的先进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纷纷饥不择食地利用“以太”、“星云”、“原子”、“细胞”、“电”、“力”等自然科学概念，来“改造”传统哲学，并力图在传统的人性论中输入天赋人权以及博爱、平等、自由等新内容。面对西学的冲击，朝野间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奇技淫巧”，一概拒之于门外；一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但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多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我所用。

以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上升到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为流传。在中西文化交汇中，西方文化中许多积极的东西为我们借鉴和吸收。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增添了新的有生命力的成份。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腐朽的、反动的东西也乘机而入。“五四”以来实用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就在胡适（实用主义），梁漱溟、张君勱（生命哲学），丁文江（马赫主义），张东荪（新康德主义）等人那里与中国封建主义哲学结合成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特点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人在他们的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中力图求新，但终未跳出封建哲学的窠臼，不仅不能上升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高度，甚至连他们所借鉴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水平也没有达到。

中西文化的撞击，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军事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诸种社会矛盾的尖锐等等，引起人们深刻的文化反省，于是有东西方文化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亦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社会性质的争论，国民性的反思，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等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步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些讨论，并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李达、艾思奇、胡绳等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毛泽东思想

的形成，标志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四节中国哲学新体系的建构

中国哲学发端于商周之际，带有早熟的特征，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刚强与柔弱、进步与愚昧、革新与守旧于一体，对它采取全盘接受和全面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正确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似今天这样停留在对古代哲学家的著述进行研读和评论远远不够了，欲使我们的扬弃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学在近代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古代思想家无法比拟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博大精深，并成为孕育科学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古典哲学的终结。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取了西方哲学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它的范畴体系，它论述的主要原理，与渊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近代哲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它对西方古典哲学的扬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解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极有意义。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所不同。如众所知，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滥觞”，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汉以来的名家大儒在继承的基础上虽然有所发展，并且其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但很难有哪一个能够集中国哲学之大成，建立起类似于德国古典哲学那样博大精深的体系，更不用说出现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的哲学体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但它属于我们时代，属于全人类。当我们强调这一点的时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之日，就是中国哲学夭折之时。如果说西方哲学在现代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说中国哲学在现代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有责任使中国哲学发扬光大，如果说现代西方哲人已不再重复“太阳有人有脚那么宽”，“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灵魂是由精致的原子组成的”，那么，当代的中国哲人们也应跳出中国哲学的史学窠臼（至少不能再停留在、拘泥于史学领域），而应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建立一个科学的中国哲学原理体系。

中国哲学新体系的建构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其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

（1）中国哲学在范畴和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有明显区别，它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并未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不应该仅仅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例证、辅助材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取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

哲学和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并不互相排斥。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具有领导地位，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指导地位。建立中国哲学新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的立场和方法，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结合，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原则。

(2) 必须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础，“扬弃”中国传统哲学中那些陈腐愚昧的、主观臆想的、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成份，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和带有复古色彩的成份，改变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滞后于人类文明、以古董的原貌客串于现代社会的状况，让古老的龙文化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3) 深刻领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把握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建构起中同哲学的理论框架，按照中国哲学的固有特色、思路和论证方法论证和阐述；坚决反对机械地照搬西方哲学范畴，套用西方哲学逻辑体系的做法。

(4) 范畴的界说和使用，观点的阐述既要科学，又要尽量忠于古代思想家的本意，符合于传统的，大家比较一致的理解。改造中有保留，以保留为主改造为辅，不能搞得面目全非。

(5) 对传统哲学思想材料的运用上要有面有点有主有辅。应引起特别注意的有四大部分：第一，先秦诸子及易学哲学思想；第二，佛教哲学，魏晋玄学、程朱陆王之学；第三，秦汉以来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第四，近代启蒙学者。

(6) 中国哲学应是一个人学哲学体系。诸如“易”之所谓“大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想；儒家提出的“修、齐、治、平”（三纲领、八条目）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各家各派哲学对人生、道德、治国等方面问题的关注都反映出中国哲学的人学特征。

对中国哲学的人学哲学特征要从人生观、人才学、人生智慧的角度来把握，它不是纯思辨的理性体系，而是具有一定理性高度的实践哲学。具体表现在明显的入世倾向，对道德践履的强调，对经世致用的重视，以及后期在批判空谈“性命义理”，反对道学唯心主义的思潮中表现出来的倡实学、重习行的倾向；在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难易问题上对“行”的肯定和重视等等。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对政治问题亦给以极大的关注。但它不是一般的伦理学、政治，而是融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于一体的人学哲学。

作为人学哲学的中国哲学体系，大体上应包括如下内容：

天道观

包括天道自然说和阴阳变易说。天道自然说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本原问题，需在扬弃老子“道之为物”的思想和气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立论。二是宇宙发生说，深刻领会老子宇宙发生说的精神实质，建立起“道——气——阴阳——万物”的有机联系，在此基础上描绘出宇宙

演化的图景。本部分涉及的范畴主要有：道器、气或元气、无有、体用、阴阳、形而上形而下等。阴阳变易说部分的内容类似于西学之辩证法，阐述“生生谓易”、“大化流行”的思想，先秦时期《周易》，老子《道德经》、兵家哲学中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为汉以来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本部分涉及的主要范畴有阴阳、正反、常变、两一、静动、同异、无穷、反复、易、日新等。

知行观

阐述由行而知、知为了行、行先知后的知行统一观，坚持认识论上的反映论立场，仅从孔子、墨子、荀子、王充、王夫之等人的认识论思想而言就论及了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认识的来源、认识方法、认识的两个阶段（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目的和能动性、认识的检验及逻辑问题（如名实关系）。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一些重要思想。如名家“坚白”之论，魏晋“言意”之争，王廷相关于“见闻—思虚—接习”的思想，颜元对“格物”的理解及其对“实学”、“习行”的重视等。在中国哲学史上，“格物致知”的命题，知行关系的展开，形神、心物、能所、学思、名实、言意问题的争论都是引人瞩目的。

人道观

中国哲学之人道谓人事、为人之道，或社会规范等。人道观应包含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天人关系论。重点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的思想和“制天命而用之”、“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解决了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运动与人类意志，人、社会与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2）人事辩证论。诸如常变、理势、经权、损益关系等等。从辩证观点看待人和人类社会历史，揭示社会历史辩证运动、无限发展的特征。（3）道德论。主要解决人性、个人修养、人与人关系调整等问题。涉及性习、义利、理欲，善恶的相互关系，智、仁、勇等道德规范，以及道德修养方法、道德社会作用等。（4）政治论。政治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儒家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许多思想家本人都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他们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孔孟的“德治论”，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论”以及墨子提出的“尚力”、“非命”、“尚贤”、“尚问”、“兼爱”、“非攻”、“非乐”、“节用”等）而且努力付诸于实践。我们必须在批判地借鉴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

